

五代北宋時期泉州海上交通之發展

李 東 華

本人前作「唐末泉州的興起及其背景」(臺大歷史學系學報第九期)一文,已對唐代泉州海上交通興盛的原因作了探討,從而說明泉州對外交通的興起是世界性海上貿易圈形成下的產物。其後本應接敘五代時期的發展,然純就泉州對外交通而言,五代實為關鍵時期,已萌芽的海上交通在五代有了重大的轉機,奠定了宋代泉州對外交通的深厚基礎,到宋室南遷,泉州始因客觀環境的改善而進入另一全盛時期。因此,本文將五代、北宋泉州對外交通合併討論。本文先就五代及北宋設置市舶司以前泉州的對外交通加以探討,其次對五代、北宋時代泉州對外交通轉盛的原因,作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最後再就泉州市舶司設置後的對外交通加以敘述,希望能深入而清楚的闡釋泉州在這段重要轉折期間對外海上交通的演變。

第一節 五代時期泉州對外交通之進展

五代時期在我國歷史上雖不占重要地位,但在福建地區之發展史上,十國中的閩却居舉足輕重的地位,根本的改變了福建往後的歷史發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海外交通與貿易的重大轉變。此種轉變的最大原因,一係福建地區之割據所造成的孤立,一係主政者之積極獎勵海上貿易。就前者而言,泉州在唐宋之間,由唐光啓二年(八八六)王潮割據泉、漳起,至陳洪進宋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納土歸降止,前後在割據的局面下單獨發展達九十年之久。就後者而言,這段時期中主泉政者,前之王審知,後之留從效、陳洪進等,均在主觀、客觀形勢驅使下,積極的鼓勵對外貿易,對泉州海上交通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割據之初,王朝、審知、審邽兄弟先占有泉、漳、汀三州,大順中(八九〇~一)更北上併有福、建二州,因此由此時起至九四五年南唐滅閩止,福建地區均在王氏控制下。九四五年後,留從效據泉、漳,雖奉南唐正朔,但實際為割據獨立的

局面，使泉州地區更脫離福建其他三州，單獨發展三十餘年。地位的孤立，形成它與其他地區不同之發展方向。由於割據一方，又與鄰近地區如粵之南漢、浙之吳越，處於敵對狀態，致彼此交通幾乎完全中斷，**舊五代史**卷一三四王審知傳載：

是時（王審知為政時），楊氏據江、淮，故閩中與中國隔越，審知每歲朝貢，汎海至登、萊抵岸，往復頗有風水之患，漂沒者十四五。

已說明了閩時期福建地位的孤立，至後期留、陳據泉、漳時，情況更為惡劣。留從效自述其情云：

此一方（指泉、漳）東漸於海，與福州世為讎敵；南限於廣州瘴厲之地，人使不通，西連鄞水（即汀江），皆猿徑鳥道，近歲干戈屢動，三農廢棄，冬征夏歛，僅足自贍。¹

這種情形使得福建地區過去南與廣州，北與明州、杭州、揚州的海上交通，完全斷絕，加上福建人口之大量增加，農業生產之不足（詳後），主政者乃順應客觀情勢的發展，主動積極的提倡對外貿易，因此，福建地區對外海上交通非但未因政治割據而受到不利影響，反而有更大的進展。這在閩時期及留從效、陳洪進時代，都有明確的史料記載。**新五代史**稱王審知「招來海中蠻夷商賈」²，其招來之實情，除曾開福州港水道以利交通外³，亦有一鱗半爪，可供一述。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九五張睦傳載：

張睦，光州固始人。唐末從太祖（王審知）入閩。太祖封琅琊王，授睦三品官，領榷貨物（務）。睦搶攘之際，雍容下士，招來蠻夷商賈，歛不加暴，而國用日以富饒，累封梁國公。

可見王審知治下之福建，曾置榷貨務，以處理外來蠻夷商賈貿易之事。他更曾派員出使南海，**同書**卷九十太祖世家載：

（閩）開平四年（九一〇）□□月，命員外郎崔□□聘於南海。

五國故事卷下亦載：

又嘗使南方回者，以玻璃瓶獻之。

而曾任王審知推官之黃滔，更在「賈客詩」中吟道：

大舟有深利，滄海無淺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鯨鯢齒上路，何如少

1 見宋路振，**九國志**（商務叢書集成初編據守山閣叢書影印本），卷十閩臣傳，留從效對南唐屯將語。近歲干戈屢動係實情，如**十國春秋**卷九十所云：「同光二年（九二四）夏四月，（南）漢之引兵入寇，也汀、漳境上，擊之，敗歸。」

2 見**新五代史**卷六八，閩世家王審知傳。

3 詳「唐末泉州的興起及其背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九期，民七十一年十二月），頁一四八。

經過。⁴

海外貿易所獲之利，竟使商人不顧海路之險惡，外出經商，而為詩人所不取。至於外人來閩，除唐末之三佛齊人外，亦有見諸記載者。淳熙三山志卷三三載：

（福州）龍德外湯院，崇貢里，（天福）十年（九四五）置。地多燠泉，數十步必一穴，或迸河渠中，味甘而性和熱，勝者氣如琉黃，能熟蹲鴟，旱潦無增減。僞閩天德二年（九四四），占城遣其國金氏娑囉來，道里不時，遍體瘡疥，訪而沐之，數日即瘳，乃捐五千緡，創亭其上，仍集鳩僧以司之。陳莊記慶曆二年（一〇四二）修，有蕃書二碑在。⁵

占城人所至雖在福州，但反映了福建地區對外海上交通之盛。至於泉州地區，王邦（審邽）招寶侍郎一事即為最佳之說明。王審邽係審知仲兄，景福二年（八九三）王潮、審知兄弟北上福州時，審邽即留任泉州刺史，前後十二年，元祐二年（九〇五）卒⁶。其後終閩之亡其子延彬、延美、延武，孫繼嚴、繼業、繼勛相繼出任泉州刺史，其中尤以延彬兩度出任此職，前後共計二十六年（天祐元年九〇四—天成元年九二六，天成元年十二月—長興元年九三〇）⁷為最久。此即五國故事謂其「招寶三十年，每發蠻舶，無失墜者」的原因。可見泉州對外貿易亦不稍讓福州。無怪乎後世對王氏在閩之海外貿易要大書特書。天祐三年（九〇六）立之王審知德政碑序文云：

（三）佛齊國雖同臨照，靡襲冠裳，舟車罕通，琛賁罔獻。□亦踰滄海，來集鴻臚。此乃公示以中孚，致其內附，雖云異類，亦慕華風。宛土龍媒，寧獨稱於往史，條支雀卵，諒可繼於前聞。……凡列土疆，悉重征稅，商旅以之壅滯，工賈以之而殫貧。公則盡去繁苛，縱其交易，開譏鄽市，匪絕往來，衡麓舟蛟，皆除守禦，故得填郊溢郭，擊轂摩肩，競敦廉讓之風，驟觀樂康之俗。閩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檣蕩漾以隨波，篙楫崩騰而激水，途經巨浸，山號黃崎，怪石驚濤，覆舟害物。公乃具馨香黍稷，薦祀神祇，有感必

4 見全五代詩（商務叢書集成初編據函海本排印本），卷八四。黃滔，十國春秋卷九五有傳，言其天復元年（九〇一）充威武軍節度推官。詳請參閱韓振華，「伊本柯達貝氏所記唐代第三貿易港之Djanfou」（福建文化三卷一期），頁四七。

5 清馮登府，閩中金石志（石刻史料叢書第十七冊），卷五，蕃書二碑條亦載有。

6 王昶，金石萃編（臺北，國風影印本），卷一一八，頁二二，王審知德政碑載「泉牧（王潮）遂以泉郡委仲弟審邽，而與公（審知）皆赴（福州）。」時在景福二年。又據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六文職官上，頁四泉州刺史條，太祖從弟王彥復景福二年權州事，乾寧元年（八九四）任；王審邽乾寧元年權州事，三年（八九六）任。則審邽是在八九四年始任泉州。如以泉州府志所載王延彬元祐二年（九〇五）繼其父任泉州刺史看，審邽可能是在是年去世，倒推十二年，其初任時應在景福二年，泉州府志說疑誤。

7 詳見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六，文職官上，頁四一五。

通，其應如響。祭罷，一夕震雷暴雨，若有冥助，達旦則移其艱險，別注平流，雖畫鷁爭馳而長鯨弭浪，遠近聞而異之。……賜名其水爲甘棠港。

其銘文更曰：

佛齊之國，綏之以德。……關譏不稅，水陸無滯，遐邇懷來，商旅相繼。黃崎之勞，神改驚濤，役靈祇力，保千萬艘。⁸

先言其招來三佛齊入貢之功，次敘其招來政策所帶來閩中貿易之盛況，終頌其開福州港之功德。其中尤以鼓勵商賈來華貿易，竟至「關譏不稅」之境地，最值得注意。此種鼓勵政策下福建對外貿易給當地帶來了極大的財富，宋初「重建瑯琊王廟碑」寫的最明白：

公（王審知）生當離亂之運，出值艱難之秋，劃據一方，蕃養百姓，得深溝高壘之固，存披堅執銳之衆。瞻水陸之產，通南北之商。鑄銅於蜀山，積粟於洛口者，不足於言其富也。連臨淄之袂，投滌河之簞者，不足於言其庶也。⁹

富庶至此，非海外貿易所得，何克及此！

至於留從效九四六年據泉、漳後，福州歸吳越，建、汀則歸南唐，泉州地區更形孤立，與鄰近地區既在敵對狀態之下，對外貿易只得避開這些地區，長途泛海販易，這是福、泉並興局面的結束，也是中外海舶由南海直接大量來泉州貿易的開始。前引閩書已知其兩次擴建泉州城，在泉州開發史上厥功至偉；宋史留從效傳復謂其「出自寒微，知人疾苦，在郡專以勤儉愛民爲務，常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之側，出則衣之。每言我素貧賤，不可忘本。民甚愛之，部內安治。」¹⁰其與外國貿易之事亦見於記載。泉州留氏族譜載：

泉州城市舊狹窄，至是擴爲仁風、通淮等數門……陶器、銅鐵注於蕃國，取金貝而還，民其稱便。¹¹

除了說明從效擴築泉州城外，更指出了泉州對外貿易的一般情形。大致是以所出產的陶器、銅鐵運銷國外，其交往之蕃國，包括新羅、高麗與南海諸國。十國春秋卷九六閩王倓傳載：「是時景宗官左僕射……會新羅國遣使來聘，且獻寶劍。」同書卷九二閩三景宗本紀云：

8 王審知德政碑文除金石萃編外，閩中金石志及清陳榮仁，閩中金石略（石刻史料叢書第十七冊）均有，尤以閩中金石略校刊最精。

9 「重建瑯琊王廟碑」文係宋開寶九年（九七六）福州刺史錢昱撰，收入閩中金石志，卷六。閩中金石略亦有。

10 見宋史卷四八三留從世家。

11 轉引自莊爲濤，「談最近發現的泉州中外交通的史蹟」，頁四四。

初通文（九三六～八）中，（閩）常越海通使於契丹。

新五代史卷六十八閩世家第八亦載：

昶世（即通文年間），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劍。……曦既立（永隆年間，九三九～四二），而新羅復獻劍。

既能通使於契丹，與高麗之往來當亦不難。泉州府志曾有五代時高麗僧元納居於南安福清寺的記載¹²。鄭麟趾高麗史卷一太祖世家五年（後唐明宗元成三年，九二八）載：

新羅僧洪慶自唐閩府航載大藏經一部至禮成江，王親迎之，置於帝釋院。更可明顯看出雙方的交往，這是宋代福建商人（尤以泉州商人為最多，詳下節）往高麗商賈之先聲，也是五代時泉州海外貿易開展的明證。至於泉州與南海之交通，則可由其向中朝上供之貢品中看出。十國春秋卷九二閩三景宗本紀永隆三年（九四一）條載：

王延羲（審知少子）冬十月貢白金四千兩，象牙二十株，葛五十疋，乾薑、蕉、乳香、沉香、玳瑁諸物，謝恩加官。

宋史卷四八三留從效傳載：

從效遣衙將蔡仲賢等為商人，以帛書表置革袋中，自鄂路送款內附。又遣別駕黃禹錫問道奉表，以獬豸通犀帶、龍腦香數十斤為貢。¹³

宋史同卷陳洪進傳亦載：

建隆四年（即乾德元年，九六三），（洪進）遣使朝貢，是冬，又貢白金萬兩，乳香、茶、藥萬金。¹⁴

及江南平，吳越王來朝，洪進不自安，遣其子文顯入貢乳香萬斤，象牙三千斤，龍腦五斤。¹⁵

宋會要輯稿蕃夷七更載：

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四月，陳洪進進銀千兩，香二千斤，乾薑萬斤，葛萬疋，生黃茶萬斤，龍腦、蠟面茶等。（蕃夷七之七）

同年八月五日，陳洪進來朝，對於崇德殿，進相見銀萬兩，絹萬疋。謝允朝覲絹千疋，香千斤。謝降使遠加勞問絹千疋，香千斤。謝遠賜茶藥絹千疋，

12 高麗僧元納居福清寺事，見十國春秋卷九九。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壇廟寺觀志亦有記載。

13 宋會要輯稿（北平圖書館影印本，民二五年）蕃夷七之一，謂留入貢在宋太祖建隆元年（九六〇）十二月二十三日。

14 宋史卷一太祖本紀同。

15 宋會要輯稿蕃夷七之六，謂其入貢在開寶九年（九七六）七月十三日，象牙作二千斤，白龍腦為五千斤，略有不同。

香千斤。謝迎春苑賜宴絹千疋，香千斤。謝差人船絹千疋，香千斤，幣帛二千疋，塗金鞍勒馬絹一疋，錢二百萬。其子文顯進絹千疋，又進賀登極香萬斤，牙二千斤，又乳香三萬斤，牙五千斤，犀二十株，共重四十斤，蘇木五萬斤，白檀香萬斤，白龍腦十斤，木香千斤，石膏脂九百斤，阿魏二百斤，麒麟竭二百斤，沒藥二百斤，胡椒五百斤。又進賀納后銀千兩，綾千疋。又謝賜都亭驛安下乳香千金。謝追封祖考及男以下加恩，乳香萬三千斤。又進通犀帶一，金匣百兩，白龍腦十斤，金合五十兩，通牯犀一株，金合百兩，牯犀四株，金合兩百兩，眞珠五斤，玳瑁五斤，水晶碁子五副，金合六十兩，乳香萬斤。九月六日，陳洪進貢助宴銀五千兩，乳香萬斤，泉州土產葛三萬疋，乾薑兩萬斤，金銀器皿二千二百兩，綾二千匹。十三日，陳洪進銀萬兩，錢萬貫，絹萬疋，謝恩乳香二百斤，牙二千斤。（蕃夷七之七～八）

（同年）十一月，陳洪進貢賀開樂乳香五千斤，象牙千斤。（蕃夷七之九）其貢品中屬泉州土產者，不過葛、絹、綾、乾薑等，其餘如乳香、龍腦香、沒藥等各種香料，及象牙、犀角、玳瑁、眞珠等俱非閩南土產，而係泛稱之南海所產。此外，太平寰宇記中記泉、漳土產中，列有「海舶香藥」項¹⁶，當亦係來自南海。其時與廣州貿易既已中斷，這些東西當係直接來自南海諸地，而數量之大，品類之多，尤足以顯示其時泉州與南海貿易之盛。

總之，在五代宋初王、留、陳三氏之經營泉、漳，獨立發展對外貿易，對泉州海外交通之發展，意義極爲重大。成田節男認爲泉州之對外交通至五代始有稍爲具體之史料出現，王廣武更認爲王、留二氏之經營爲奠定「泉州時代」來臨之重要關鍵。¹⁷其中尤以開其後閩商赴海外貿易之先機及奠定泉州對外直接交通之基礎兩項爲最重要。在此之前因往來航程過長，及政府對國人下海並不鼓勵，故多外商來販，我國人之下海者極爲有限。自五代始則因航海工具的日漸進步，以及南漢之劉氏與閩之王氏的鼓勵對外貿易，華商出海販易者乃日漸增多，此種爲商而商，變被動

16 見太平寰宇記（文海出版社影印清嘉慶刊本），卷一〇二，江南東道泉州，漳州土產條。此處尚需說明的是當時占據兩浙、福州之吳越錢氏的貢品中，也有大量的香、藥、犀、牙等物，其與南海亦有交通亦屬必然。

17 見成田節男，「宋元時代の泉州の發達と廣東の衰微」，頁八。該文極佳，唯於頁九引宋史卷四八三陳洪進傳載宋太祖與李煜（南唐後主）詔中「泉州昔嘗附麗，尤荷撫綏」一語中之附麗，爲依附高麗，爲一明顯之錯誤。王廣武論點見其著，「The Nhai Trade: A Study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XXXI, No. 182, 1958, pp. 88-9.

爲主動之型態是我國對外海上交通的一大轉變¹⁸。而泉州適在此時由原來以廣州爲我國總吞吐口之情勢下，因政治之分裂，不得不自力直接往南海販易，也根本改變了在唐末泉州僅爲廣、揚（明）間轉口港之地位，成爲直接對外貿易的另一口岸。這兩項重大的轉變是宋代對外海上交通大盛的潛在原因，也是泉州對外貿易逐漸轉盛，終至能與廣州並駕齊驅的根本因素。

第二節 北宋設置市舶司以前泉州的對外交通

一、北宋政府對外貿易政策的轉變：

論者每謂宋代是獎勵對外貿易的時代。事實上這大半是指南宋而言的，至於北宋，與其說是主動積極的獎勵貿易，不如說它能不斷的因應海內外貿易的情勢，逐步改善並放寬對外貿易的限制來的恰當。這種情形與唐末五代以來，商人勢力的大增有莫大關係。自唐末五代以來，由於國勢衰微，內亂紛起，農民由於戰亂迫害及營商利潤之誘惑，湧入城市謀生者不少。官宦之家亦有棄官經商者，富商巨賈乃能利用其資財影響政治，躋身仕宦之林¹⁹，此種情形在五代泉州地區尤爲明顯（詳下節）。因此北宋政府雖仍抱持傳統重農抑商政策（尤其在儒學復興以後）²⁰，但在重利之引誘及商人勢力日漸增高的情勢下，許多禁令根本未曾認真執行，逐漸形同具文²¹。熙寧年間新黨執政後，對外貿易政策有大幅度的改變，北宋泉州的海外貿易最足以說明此種轉變的過程。

宋初之不重視海外貿易，可由下述二事看出。其一是平定南方諸國後，僅援唐制在九七一年設置廣州市舶司處理「蕃貨海舶貿易征權」諸事²²，對已有良好對外貿易基礎之泉州、明州則未置市舶司。其次是對唐末以來華商出海貿易的事實也予扼殺，嚴禁華商下海，一直到雍熙二年（九八五）還有「禁海賈」詔令的頒布²³。對外商來販，雖並不禁止，但由於外貨至廣、泉、交、兩浙後，全由官榷，因此也禁止民間與外商私自貿易。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載其事云：

18 此段受吳景宏先生之啓示。詳見氏著「五代兩宋時代中菲關係之探討」（《大陸雜誌》三二卷二、三、四期，民五五年），頁三～四。

19 見李陳順妍，「晚清的重商主義」（原刊中研院近史所集刊三集），收入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時報出版社，民六九），頁三三四～五，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及其變遷一節。

20 參宋晞，「宋代士大夫對商人之態度」（收入宋史論叢，國防研究院，民五一），頁四～一四。

21 詳見 E. A. Kracke, Jr., "Sung Society, Change Within Tradi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 XIV, 4(1955), p. 484.

22 見宋會要職官四四之一提舉市舶司條。宋史卷一八六，食貨下，互市舶法條同。

23 宋史卷五太宗本紀二，雍熙二年九月己巳條。

太平興國（九七六～八三）初，京師置榷易院，乃詔諸蕃國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泉州、兩浙，非出於官庫者，不得私相市易。²⁴

同書職官五五也記載了太平興國元年（九七六）嚴禁華民與蕃客貿易的詔令：

敢與蕃客貿易，計其直滿一百文以上，量科其罪，過十五千以上黥面配海島，過此數者押送赴闕，婦人犯者配充針工。²⁵

在官榷貿易政策下，對外貨之流通，影響極大。至太平興國二年香藥庫史張遜乃建議出官庫香藥寶貨，加價賣予商人，外貨流通稍廣。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八載其事云：

（太平興國二年正月乙亥）香藥庫使高唐張遜建議，請置榷藥局，大出官庫香藥寶貨，稍增其價，許商人金帛買之，歲可得錢五十萬貫，以濟國用，使外國物所泄，上然之。一歲中果得三十萬貫，自是歲有增益，卒至五十萬貫。²⁶

其後此專賣香藥之榷藥局（宋會要作香藥易院）更併入榷貨務，與他貨一同出賣²⁷。此次張遜請轉售香藥予商人獲得重利，是宋初對外貿易政策轉變的重大因素，蓋宋室發現出售多餘香藥寶貨予商人可獲重利。因此乃有太平興國七年（九八二）放寬官榷貨物種類的措施：

（閏十二月）詔，聞在京及諸州府人民或少藥物食用，令以下項香藥止禁榷廣南、漳、泉等州舶船上，不得侵越州府界，紊亂法條，如違，依條斷遣，其在京并諸處即依舊官場出賣，及許人與販，凡禁榷物八種：瑇瑁、牙、犀、賓鐵、鼈皮、珊瑚、瑪瑙、乳香。放通行藥物三十七種：（下略）。²⁸

此詔後半段所言，不但縮小了官榷的範圍，而且非禁榷物可在當地出賣，許商人與販，對外貨之流通與商賈之貿易均有甚大便利。外商來販既對皇室有利，乃有五年後派遣內侍赴南洋招徠商賈及加設兩浙市舶司之舉：

雍熙四年（九八七）五月遣內侍八人齎勅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眞珠、龍腦。每綱齎空名詔書三道，於所至處賜之。²⁹

24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下，互市舶法條略同。

25 見宋會要職官四四之一～二。宋史卷一八六食貨下互市舶法條，亦引此詔，惟十五千以上黥面，作「十五貫以上」，亦同。

26 宋史卷二六八張遜傳略同。

27 宋會要食貨五五云：「大中祥符二年（一〇〇九）二月，（榷藥局）撥併入榷貨物。」

28 宋會要職官四四之二。

29 宋會要職官四四之二。

設置兩浙市舶司則在端拱二年（九八九）左右。³⁰初置於杭州，後移明州，後更兩處分別設置，聽蕃客從便³¹。同時更頒布了華商赴海外貿易的辦法。宋會要職官四四之二載端拱二年五月詔云：

自分商旅海外蕃國販易者，須於兩浙市舶司陳牒，諸官給券以行，違者沒入其寶貨。³²

至此，才確立了宋初招徠外蕃，准許國人赴海外貿易的政策。其時去太祖創業開國已近三十年，去九七一年滅南漢與外蕃接觸起，亦近二十年。

在這種政策執行下，雖然走私貿易不絕（詳下節），但大體來說政府收入亦不惡，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互市舶法條載：

天聖（一〇二三～三〇）以來，象、犀、珠玉、香藥、寶貨充牣府庫，嘗斥其餘以易金帛、芻粟，縣官用度，實有助焉。

此政策大體言之，除禁榷之不斷放鬆外³³，迄神宗熙寧年間（一〇六八～七七）未有重大改變。在此期中所見之補充禁令，均係針對日後所生不法事件所頒。補充禁令，約有以下四項：

（一）禁往高麗、新羅及登、萊二州貿易：慶曆年間（一〇四一～八）勅令云：

客旅於海路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若往餘州，并須於發地州軍，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出賣，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不夾帶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即爲出給公憑，如有違約及海舶無公憑，許諸色人告捉，船物并沒官，仍估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充賞，犯人科違制之罪。³⁴

不准往高麗、新羅及登萊販易，主要是針對遼（契丹）而發的。恐海商往高麗「遂通契丹」，而又懷疑高麗等國與契丹私通。

（二）嚴禁明州市舶所轄往南海，廣州市舶所轄往日、韓貿易：

諸非廣州市舶司輒發過南蕃綱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發過日本、高麗者，以

30 詳見藤田豐八，「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條例」（收入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頁二六五～六。石文濟，「宋代市舶司的設置」（宋史研究集第五輯，民五九年），頁三四八亦可參看。

31 杭州市舶司在淳化三年（九九二）移於明州。次年，又移歸杭州。至真宗咸平二年（九九九），兩州並置。見同上註。

32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下，互市舶法條略同。

33 如宋會要職官四四之二載淳化二年（九九一）四月詔廣州市舶云：「（上略）自今，除禁榷貨外，他貨擇良者，止市其半，如時價給之，竊惡者恣其賣，勿禁。」

34 此令見三蘇全集東坡集卷二八奏議，「乞禁商旅過外國狀」所引。其後嘉祐年間（一〇五六～六三）曾重申前令。

違制論，不以赦降去官，其發高麗船仍依別條。³⁵

是明白顯示廣州市舶掌南海貿易，而兩浙市舶掌日、韓貿易。

(二)嚴禁無市舶司地區船舶出海，即嚴禁走私貿易。有關此項禁令，淳化五年（九四四）曾重申太平興國元年前令而處罰較輕：

四貫以上徒一年，遞加二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地充役兵。³⁶

(四)禁銅錢出口。續通鑑長編卷一三二載慶曆元年（一〇四一）五月詔云：

乙卯，詔以銅錢出外界，一貫以上，爲首者處死。其爲從者，若不及一貫…
…廣南、兩浙、福建人配陝西。其居停貿給者，與同罪。如捕到蕃人，亦決配荆湖、江南編管。

這些禁令，對中外海上交通也有或多或少的不利影響。以上這些政策在熙寧年間有了重大改變，這與新法之施行有莫大關係。新政既以理財爲一重要政策，因此乃對宋初以來的商業政策做了徹底的檢討。其在對外貿易方面的改變大體可分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是對海外貿易限制的放寬，對過去未認真執行之禁令，加以廢除，使國人海外貿易之限制減至最少，以增加貿易量。另一方面則對財政體系作一全面的變革，使財稅組織更趨系統化、制度化，將前述化暗爲明的海外貿易納入體系之中，加強管制，以減少財稅之漏失，增加國庫之收入。有關前者，如銅錢出口禁令在熙寧七年（一〇七四）即被廢止。續通鑑長編卷二六九載熙寧九年張方平論錢禁云：

自熙寧七年頒行新勅，刪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錢幣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

對高麗貿易之禁令，也在元豐八年（一〇八五）解除：

商賈由海道販諸蕃，惟不得至大遼國及登、萊州，即諸蕃願附船入貢或商販者，聽。³⁷

這兩項禁令的解除，無疑對海外貿易有重大影響，但另一方面由於財稅體系之系統化與制度化，福建地區長期以來的走私貿易，也爲中央正視，而逐步納入了管制之中。熙寧二年行均輸法後條例司即曾建議以發運使兼掌市舶，以納市舶入中央財政體系中。續通鑑長編拾補卷五熙寧二年九月條載：

壬午，條例司言銀、銅、冶坑、市舶之物皆上供而賣出諸路，故轉運使莫肯爲，課入滋失。今既假發運使以錢貨聽移用六路之財，則東西南經費皆當由公辦，謂令發運使副兼提舉九路銀、銅、冶坑、市舶之事，條具利害以聞。

35 見東坡集卷二八奏議，「乞禁商旅過外國狀」引元豐八年（一〇八五）九月十七日勅令節文。

36 宋會要職官四四之二。

37 引自東坡集卷二八奏議，「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乃詔發運司薛向、副使羅極（拯）兼都大提舉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廣南等路銀、銅、鉛、錫、坑冶、市舶等，從之。

對市舶等已有加強管制，集中事權之意。熙寧五年行市易法後，在各處置市易務，更有將市舶司併入市易務之意，因故未行³⁸。但終於在元豐三年（一〇八〇）將原由地方官兼理之市舶司，改由轉運使兼理，市舶成為中央財稅系統之一環。宋會要職官四四之六云：

元豐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中書言，廣州市舶條已修定，乞專委官推行。詔廣東以轉運使孫迥，廣西以轉運使陳倩，兩浙以轉運副使周直孺，福建以轉運判官王子京，迥、直孺兼提舉推行，倩、子京兼覺察拘攔，其廣南東路安撫使更不帶市舶司。

此詔變地方官兼理市舶為轉運司兼理，無疑為一大轉變。³⁹而此詔言於福建路置覺察拘攔，亦係針對福建地區走私貿易而發，希望能加強管制，以減少賦稅漏失。前此更有人建議於泉州置市舶司（詳見本文第四節），因此早在熙寧七年（一〇七四）已有加強對泉、福諸地外貨處理之詔令：

（熙寧）七年正月一日詔諸舶船遇風信不便，飄至逐州界，速申所在官司，城下委知州，餘委通判或職官，與本縣令佐躬親點檢。除不係禁物稅訖給付外，其係禁物即封堵，差人押赴隨近市舶司勾收抽買。諸泉、福緣海州，有南蕃海南物貨船到，並取公據驗認，如已經抽買，有稅物給到回引，即許通行，若無照證及買得未經抽買，物貨即押赴隨近市舶司勘驗施行。諸客人買到抽解下物貨，並於市舶司請公憑引目，許往外州貨賣。如不出引目，許人告，依偷稅法。⁴⁰

是可見泉、福諸州在市舶司設置之前，對外來船貨已有完稅抽買後即可自由行銷的規定，這一方面顯示了泉、福地區外貨日盛，政府不得不加強管制，以使其制度化。另一方面，此詔也表明了貿易地區的放寬。前此只有置市舶司處（即廣、杭、明三州）准許外商貿易，此後蕃舶於抽解後，沿海各地無不可貿易。前引續通鑑長編卷二六九熙寧九年張方平論錢禁云：

自熙寧七年頒行新勅，刪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

38 宋會要職官四四之六載其事云：「熙寧七年七月十八日，詔廣東路提舉司劾廣州市易務勾當公事呂邈，以擅入市舶司拘攔蕃商物故也。十九日，詔廣州市舶司依舊存留，更不併歸市易務。」

39 文獻通考卷六二，職官考十六提舉市舶條謂：「熙寧中始變市舶法。……舊制雖有市舶司，多州郡兼任，元豐中始令轉運使兼提舉，而州郡不復預也。」其下文與會要同。

40 見宋會要職官四四之六。

而回。……諸銅舶舊制，惟廣州、杭州、明州市舶司爲貿納之處，往還搜檢，條列甚嚴，尚不得取便至他州也。今日廣南、福建、兩浙、山東，恣其所往，所在官司，公爲隱庇。

以上這種一方面開放貿易地區，一方面則在諸貿易地區加強管制，是熙、豐新政在對外貿易方面的重大轉變，終於造成日後沿海州郡紛紛設置市舶司的結果⁴¹，泉州卽在元祐二年（一〇八七）設置了市舶司。

二、設置市舶司以前泉州的對外交通：

前節已說明了五代時期福建對外海上交通有長足的進步，奠定了宋代泉州海上交通繁盛的基礎。因此，雖然宋初並未在泉州設置市舶司，但由於主客觀情勢之逐步成熟（詳下節），泉州對外交通繼續發展，終於在熙、豐以後對外貿易政策改變下，朝廷採納了地方官吏的建議，於元祐二年在泉州設置了市舶司，本段僅就置司前泉州對外交通作一探討，置司以後暫不論及。

經過五代的發展，到北宋初年，泉州的對外貿易地位已很重要。前引宋會要職官四四之一卽載：

太平興國初，京師置榷易院，乃詔諸蕃國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泉州、兩浙，非出於官庫者，不得私相市易。

同書同卷又載：

（太平興國）七年閏十二月詔，聞在京及諸州府人民或少藥物食用，今以下項香藥止禁榷廣南、漳泉等州舶船上，不得侵越州府界，紊亂法條。

陳洪進降宋在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這兩段記載明顯的反映了泉州對外貿易因陳洪進之納土歸降而絲毫未受影響，也說明了泉州地區經過五代的發展後，已與交、廣、明三州並稱爲外蕃來販的重要據點。但其後宋僅在廣州及兩浙設置市舶司，泉州未置。其未在泉州設置市舶司之原因，雖未見有關史料，但閩省與內陸交通運輸之不便應爲一重要原因。蓋宋代禁榷貿易，貴重者皆須運往京師榷易，廣州、杭州、明州與內陸交通均較便利⁴²，福建與內陸交通之困難狀況，至有「北畔是山南畔海，祇堪圖畫不堪行」的說法⁴³，其不便可知。泉州雖未設置市舶司，但商販出海貿易風氣已經形成，故在北宋時期，官方記載雖少見有關泉州對外交通之事，但

41 如哲宗元祐二年（一〇八七）置泉州市舶司，次年置密州市舶司於板橋鎮，徽宗政和三年（一一一三）之置秀州市舶司等。

42 廣州可利用北江水運至南雄，越大庾嶺至虔州後，卽又可利用贛江水運轉長江北入汴。詳見全漢昇，「宋代廣州的國內外貿易」（《史語所集刊》八本三分），頁三三五。明州、杭州利用大運河更爲方便。

43 五代詩人杜荀鶴語。見全五代詩卷四，「閩中秋思」。

試閱若干相關記載，即知泉州對外貿易並非不盛。仁宗末曾兩度出任泉州知州的蔡襄所著荔枝譜中即載有：

（荔枝）水浮陸轉以入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流求、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誘之，故商人販益廣，而鄉人種益多，一歲之出不知幾千萬億，即鄉人得飫食者蓋鮮，以其斷林鬻之也。⁴⁴

可見仁宗（一〇二三～六三）時，泉州商賈赴海外販荔枝者已不少。接替蔡襄守泉之關詠，亦有有關泉州海外貿易之資料。乾隆泉州府志卷二九名宦一關詠傳云：

關詠……嘉祐八年（一〇六三）自太常少卿知泉州。……泉有蕃舶之饒，官州者多市取其貨，十不償一，惟詠與參軍杜純無私買，竟以不察舉他官坐免。

宋史卷三三〇杜純傳亦云：

（純）以蔭爲泉州司法參軍。泉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時官於州者私與爲市，價十不償一，惟知州關詠與純無私買，人亦莫知。後事敗，獄治多相牽繫，獨兩人無與，詠猶以不察免，且檄參對。純憤懣，陳書使者爲訟冤，詠得不坐。

都說明了泉州置司以前對外貿易已相當繁盛。不過最足以說明泉州對外交通之盛者，還是泉州商人掌握宋麗（高麗）貿易之事。

有關泉州商人與高麗貿易的問題，宋晞先生曾根據鄭麟趾高麗史卷四至卷二八世家的記載，統計出自宋眞宗大中祥符五年（一〇一二，高麗顯宗三年）至南宋帝昀祥興元年（一二七八，高麗忠烈王四年）的兩百六十六年間，宋商（官方聘使來往不計）赴高麗之次數達一二九回，人數多達五千餘人。這些並無奇特之處，惟其中商人之籍貫，竟以福建路的泉州與兩浙路的明州爲最多⁴⁵。明州爲對高麗貿易市舶司所在，理有必然，而泉州商人之高居首位，實令人難以置信。此處僅就設置市舶前，宋商赴麗情形，列表於後，以作說明：

宋商赴麗一覽表

年	代	宋 商 人 數	進獻品名	備 考
宋眞宗大中祥符五年， 高麗顯宗三年（一〇一二）十月丙午		宋南楚人陸世寧等	方 物	

44 見蔡襄，荔枝譜（百川學海本），第三。該書自序署嘉祐四年，歲次己亥，是在西元一〇五九年，襄第二次出知泉州時所寫。

45 宋晞，「宋商在宋麗貿易中的貢獻」（史學彙刊第八期，民六六年八月），收入宋史研究論叢第二輯，頁一四六～五九。

眞宗天禧元年， 顯宗八年（一〇一七）	宋泉州人林仁福等四十人	方 物	✓
眞宗天禧二年， 顯宗九年（一〇一八）閏四月癸卯	宋江南王肅子等二十四人	土 物	
眞宗天禧三年， 顯宗十年（一〇一九）七月己巳	宋泉州人陳文軌等一百人	土 物	✓
同年同月壬申	宋福州虞瑄等百餘人	香 藥	✓
眞宗天禧四年， 顯宗十一年（一〇二〇）二月	宋泉州人懷賢等	方 物	✓
仁宗乾興元年， 顯宗十三年（一〇二二）八月甲寅	宋福州人陳象中等	土 物	✓
同年同月辛酉	宋廣南人陳文遂等	香 藥	
仁宗天聖元年， 顯宗十四年（一〇二三）十一月丙申	宋泉州人陳億		✓
仁宗天聖四年， 顯宗十七年（一〇二六）八月壬午	宋廣南人李文通等三人	方 物	
仁宗天聖五年， 顯宗十八年（一〇二七）八月丁亥	宋江南人李文通等	書冊凡五百九十七卷	
仁宗天聖六年， 顯宗十九年（一〇二八）九月丙申	宋泉州人李顥等三十餘人	方 物	✓
仁宗天聖七年， 顯宗二十年（一〇二九）八月己亥	宋廣南人莊文寶等八十人	土 物	
仁宗天聖八年， 顯宗二十一年（一〇三〇）七月己巳	宋泉州人盧遵等	方 物	✓
仁宗天聖九年， 顯宗二十二年（一〇三一）六月乙未	宋台州商客陳惟志等六十四人		
仁宗明道二年， 德宗二年（一〇三三）八月甲午	宋泉州商都綱林藹等五十五人	土 物	✓
仁宗景祐元年， 德宗三年（一〇三四）十二月庚寅	宋商客參加八關會	方 物	
仁宗景祐三年， 靖宗二年（一〇三六）七月辛巳	宋商陳諒等六十七人	土 物	
同年十一月己丑	宋商參加八關會	方 物	
仁宗景祐四年， 靖宗三年（一〇三七）八月乙酉	宋商朱如玉等二十人		
同年同月丁亥	宋商林贊等	方 物	
仁宗寶元元年， 靖宗四年（一〇三八）八月戊子	宋明州商陳亮、台州商陳維續等一百四十七人	土 物	

仁宗寶元二年， 靖宗五年（一〇三九）八月庚申	宋商惟積等五十人	方 物	
仁宗慶曆元年， 靖宗七年（一〇四一）十一月己未	宋商王諾等	方 物	
仁宗慶曆五年， 靖宗十一年（一〇四五）五月丙寅	宋泉州商林禧等	土 物	✓
仁宗慶曆七年， 文宗元年（一〇四七）九月丁丑	宋商林機等	土 物	
仁宗皇祐元年， 文宗三年（一〇四九）八月己巳	宋台州商徐贊等七十一人	方 物	
同年同月辛巳	宋泉州商王易從等六十二人	珍 寶	✓
仁宗皇祐四年， 文宗六年（一〇五二）八月乙酉	宋商林興等三十五人	土 物	
同年九月癸卯	宋商趙受等二十六人	土 物	
同年同月壬子	宋商蕭宗明等四十人	土 物	蕭，泉州人，詳下仁宗嘉祐三年條
仁宗至和元年， 文宗八年（一〇五四）七月庚午	宋商趙受等六十九人	犀角、象牙	
同年九月庚午	宋商黃助等四十八人		
仁宗至和二年， 文宗九年（一〇五五）二月戊申	寒食，饗宋商葉德寵等八十七人於娛賓館，黃拯等一百五人於迎賓館，黃助等四十八人於清河館		
同年九月辛未	宋都綱黃忻狀稱，臣携兒蒲安、世安來投，而有母年八十二，在本國，請遣還長男蒲安供養。許之。		
仁宗嘉祐元年， 文宗十年（一〇五六）十一月辛巳	宋商黃拯等二十九人	土 物	
仁宗嘉祐二年， 文宗十一年（一〇五七）八月丁未	宋商葉德寵等二十五人	土 物	
同年同月丁卯	宋商郭滿等三十三人	土 物	
仁宗嘉祐三年， 文宗十二年（一〇五八）八月乙巳	宋商黃景文等	土 物	高麗文宗十三年八月戊辰條：「宋泉州商黃景文、蕭宗明、醫人江朝東等將還。朝制許留宗明、朝東等三人。」則知黃景文、蕭宗明皆泉州人。
仁宗嘉祐四年， 文宗十三年（一〇五九）四月丙子	宋商蕭宋（應作宗）明等乞就街路瞻望法駕。許之。		✓
同年八月乙酉	宋商傅男等	方 物	

仁宗嘉祐五年， 文宗十四年（一〇六〇）七月乙巳	宋商黃助等三十六人	土	物	
同年八月癸亥	宋商徐意等三十九人	土	物	
同年同月乙亥	宋商黃元載等四十九人	土	物	
仁宗嘉祐六年， 文宗十五年（一〇六一）八月丙子	宋商郭滿等	土	物	
仁宗嘉祐八年， 文宗十七年（一〇六三）九月壬寅	宋商郭滿等	土	物	
同年十月庚午	宋商林寧、黃文景	土	物	黃文景泉州人， 見前嘉祐三年條
英宗治平元年， 文宗十八年（一〇六四）七月丙戌	宋商陳翬等	土	物	
同年八月甲午	宋商林寧等	珍	寶	
英宗治平二年， 文宗十九年（一〇六五）九月癸未	宋商郭滿、黃宗等	土	物	
神宗熙寧元年， 文宗二年（一〇六八）七月辛巳	宋人黃愼來見			爲泉州人，見宋 史卷三三一羅拯 條：「泉商黃謹 （即愼）往高麗」
同年同月辛巳	宋商林寧等	土	物	
神宗熙寧二年， 文宗三年（一〇六九）六月壬寅	宋商楊從盛等	土	物	
同年七月丁丑	宋商王寧	土	物	
神宗熙寧三年， 文宗四年（一〇七〇）八月己卯	宋湖南、荆湖、兩浙發運 使羅拯復遣黃愼來			爲泉州人，說見 前
神宗熙寧四年， 文宗五年（一〇七一）八月丁丑	宋商郭滿等三十三人	土	物	
同年九月乙酉	宋商元積等三十六人	土	物	
同年同月丁酉	宋商王華等三十人	土	物	
同年十月乙卯	宋商許滿等六十一人	土	物	
神宗熙寧六年， 文宗七年（一〇七三）十一月辛亥	設八關會，大宋國人	禮	物	
神宗熙寧八年， 文宗九年（一〇七五）五月乙酉	宋商王舜滿等三十九人	土	物	
同年六月丙辰	宋商林寧等三十五人	土	物	
神宗熙寧十年， 文宗十一年（一〇七七）七月己酉	宋商林慶等二十八人	土	物	
同年九月辛亥	宋商楊從盛等四十九人	土	物	

神宗元豐二年， 文宗三三年（一〇七九）八月丁巳	宋商林慶等二十九人	土 物	
神宗元豐四年， 文宗三五年（一〇八一）二月甲戌	宋商林慶等三十人	土 物	
同月八月戊辰	宋商李元續等六十八人	土 物	
神宗元豐五年， 文宗三十六（一〇八二）八月乙亥	宋商陳饒等	土 物	
哲宗元祐二年， 宣宗四年（一〇八七）三月甲戌	宋商徐戩等二十人	新莊華嚴 經板	徐，泉州人，見 蘇軾奏議「論高 麗進奉狀」
同年四月丙戌	宋商傅高等二十人	土 物	

（本表引自宋晞，「宋商在宋麗貿易中的貢獻」，略作補充）。

在元祐二年置司前六十九次至高麗的宋商中，可肯定屬閩籍者，竟有十八次之多，其中除兩次為福州商外，其餘十六次概為泉州商人。其餘僅著宋商者，可能還有籍隸泉州者。三蘇全書東坡集卷二七載元祐四年（一〇八九）「論高麗進奉狀」云：

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為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泉州商）者甚衆。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更謂：

（明州）惠國院之僧淨源，本是庸人，只因多與福建海商往還，故商人等於高麗國中妄有談說。

可見彼時宋麗貿易中，福建商人的勢力甚大。甚至在嚴禁交通高麗時期，亦有泉州商客來往高麗。前表所引黃慎（宋史作謹）其人即係明顯之例。緣宋麗間由宋仁宗天聖八年（一〇三〇）至神宗熙寧二年（一〇七〇）已四十一年無信使往還，熙寧二年高麗政府委託黃慎等於返宋時，攜帶國書與宋官吏，表示欲通使。宋史卷三三一羅拯傳載其事云：

拯使閩時，泉商黃謹往高麗，館之禮賓省，其王云自天聖後職貢絕，欲命使與謹俱來。至是，拯以聞，神宗許之，遂遣金梯入貢。高麗復通中國自此始。

文獻通考卷三二四高麗傳亦云：

熙寧二年，其國禮賓省移牒福建轉運使羅極（東坡奏議，宋史作拯）云，商人黃慎（即慎）、洪萬來稱，運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當國避居暘谷，邈戀天朝，祖禰以來，梯航相繼，萑爾平壤，邇於大遼，附之則為睦鄰，疏之則為勁敵，慮邊疆之未息。蓋陸警以靡遑，久困羈縻，難圖携貳，故違述職

。……今以公狀，附眞、萬西還，俟得報音，卽備禮朝貢。」……三年，極以聞，時議者亦謂可結之以謀契丹，帝許焉。命極諭之，以供擬腴厚之意。

此事係宋對高麗政策轉變之始，其後卽有元豐八年（一〇八五）解除禁止交通高麗之詔。其中值得注意者有三：高麗附函返宋華商傳遞信息，不至登、萊，不至密州，不至明州，竟交由福建轉運使，而黃、洪又爲泉州人，益證泉州與高麗間關係之密切，此其一。宋政府雖一再嚴禁宋商赴麗貿易，官方關係亦時斷時續，但由於禁令不嚴，宋商赴麗者，仍大有人在，黃洪特一例耳，此其二。宋麗官方往來在熙、豐前多由登州出發，在熙豐後則由明州⁴⁶，但商旅之私販（或曾於明州市舶司註冊）往禁區——高麗貿易，則遍及泉州以北的海面，蓋泉州商掌握其間部分貿易的緣故，此其三。這種情形一直到元祐泉州置司時還是如此。東坡集卷二七「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云：

訪聞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麗國，竊恐久滯，逐僧在彼不便。竊聞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除已牒明州契勘，如壽介等到來年（元祐五年）卒無因便船舶，卽一面申奏乞發往泉州附船歸國。

遣高麗僧返國，在明州久候赴高麗商舶不得，蘇軾竟欲將彼等發往泉州附商船返高麗，泉州對高麗之交通固已超過明州！再以留居高麗的華人情形來看，更知此言不虛：

（高麗）王城有華人數百，多閩人，因買船而至者。密試其所能，誘以祿仕，或強留之終身。朝廷使至，有陳牒來述者，則取以歸。⁴⁷

泉州商人在設置市舶司以前掌握宋麗貿易之實情，充分的顯示了五代以降福建商人在對外貿易中所佔的重要地位。這種情形，非但未受官方忽視的影響，反而在對外貿易禁令執行之疏忽下，更方便其下海販易的行動。這種繁盛的走私貿易終於成爲宋政府不得不在泉州設司管理，將之化非法爲合法的原因之一。

至於論及泉州對南海貿易的情形，就不如宋麗貿易，有對方留下史料可供研究。不過在我國史籍中仍有一鱗半爪，可略窺其情。在未置市舶司前，泉州商人欲往南海者，往返皆須往廣州註冊。文獻通考卷六二職官考提舉市舶條載其事云：

泉人買海外者，往復必使詣廣東（原作東詣廣，疑誤），否則沒其貨。海道回遠，竊還家者過半，歲抵罪者衆。

46 熙豐前如淳化四年（九九五）宋使陳清、劉式赴高麗，卽從登州出海。宋史高麗傳云：「往時高麗人往來皆自登州。（熙寧）七年，遣其臣金良鑑來，言欲遠契丹，乞改由明州詣闕，從之。」

47 見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文獻通考卷三四高句麗傳同。

其所謂「海道回遠」指由南海（尤其南洋羣島一帶）可利用夏季西南季風直接返回泉州，轉赴廣州是極為不便的。其往南海諸國貿易者，亦偶見記載。如往交趾即見於續通鑑長編卷二七三載熙寧九年二月壬申詔：

福建、廣南人因商賈至交趾，或聞有留於彼用事者。

福建與占城間的貿易亦甚發達。文獻通考卷三二四載占城國傳云：

占城國……北去廣州便風半月程，東北至兩浙一月程。

可見其時人對占城與兩浙間航程已頗熟知，則兩浙南鄰的福建當亦不例外。司馬光涑水紀聞卷十二更載：

慶曆三年（一〇四三）正月，廣南東路轉運司奏：前此溫、台府巡檢軍士鄂陵，殺巡檢使，寇掠數十州境，亡入占城。泉州商人邵保，以私財募人之占城，取鄂陵等七人而歸，梟首廣市。乞旌賞。⁴⁸

邵保為在廣州之泉州商，其往來於泉、廣間及廣州、占城間應極為可能。其能募人入占城取鄂陵等歸，對占城亦必極為了解，其時泉、廣、占城間之商旅往來是明顯可見的。至於南洋羣島諸國，由於開發之逐步成熟，與中國之交通亦日盛。三佛齊（蘇門答臘一帶）、勃泥（今 Brunei）、闍婆（爪哇）諸國，均位居廣州正南方海中，其來中國如順夏季之西南季風而來，至泉州雖較遠，但未必較去廣州不便。文獻通考卷三二四三佛齊國傳云：

三佛齊汎海便風二十日至廣州，如泉州，舟行順風，月餘亦可到。

是以在南洋羣島諸國逐步形成後，我國對外海上交通重心頗有東移之勢（詳下節），何況泉州尚兼擅東北亞高麗之貿易，在此頗易得廣州難見之物，自然逐漸形成三佛齊諸國來華之另一中心。宋史卷四九三闍婆傳載：

（淳化三年，九九二）明州言闍婆國遣使乘大船求貢方物。……先是，朝貢使泛船船六十日至明州定海縣……譯者言云：今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數往來本國，因假其鄉導來朝貢。⁴⁹

是可見宋初已有華商來往闍婆與中國之間，其來貢不由廣州，而由明州，可見其順風而來未必經由廣州，但泉州未置市舶，是以由明州入貢，更說明了泉州對南洋羣島交通之便利。其實，（三）佛齊人在唐末來華時，已有由福建而不由廣州的記錄。又文獻通考卷三二四勃泥傳云：

元豐五年二月，其（勃泥）王錫理麻諾復遣使貢方物，其使乞從泉州乘海舶

48 宋會要兵十一之十七略同。

49 文獻通考卷三三二闍婆傳同。

歸國，從之。⁵⁰

其時泉州尚未設置市舶司，而其使竟要求由泉州乘船回國，則由泉州去南洋羣島必有其便利之處。此亦可見泉州之重要。

至於印度洋上諸國，則以史料難稽，不易得知，不過仍有可供一述者。諸蕃志卷上天竺國條載：

雍熙間(九八四～七)，有僧囉護哪航海而至，自言天竺國人。蕃商以其胡僧，競持金繒珍寶以施，僧一不有，買隙地建佛刹於泉之城南，今寶林院是也。該僧由何處來，雖難知曉，但印度人東來，不全至廣州，亦有抵達泉州者是可以斷言的。這也提供泉州對南方的交通不限於南海的一個重要消息。

在泉州當地，晚近也發現了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一〇〇九)阿拉伯人的墓碑。碑文云：

死者名黑提漆，異國阿拉伯女人。她是有名的人高尼微的愛女，卒於同曆四百年(即大中祥符二年)□月二十四日的上午。⁵¹

這是迄今泉州發現最早的阿拉伯人墓碑，也是當時泉州已有外國人居留的最佳證據。

總之，北宋置司前，泉州對外交通的情形，因史料不全，難窺全豹，但由現存之零星史料，亦可推知當時泉州對外交通已頗興盛。其與南海交通雖不如與高麗貿易之盛，但已與交趾、占城、三佛齊、闍婆、勃泥，甚至印度，有所往來。這一繁盛的交通遂構成宋在泉州設置市舶司的主要條件。

第三節 五代北宋以降泉州海上交通轉盛的原因

五代以降，泉州能由居唐末廣、揚間轉運站之地位，一躍而為獨立對外貿易港市，其原因雖已於一、二節中約略道及，然其後復能於北宋初年之忽視泉州對外交通下，仍能持續不斷的發展，實有值得深入探討之處，爰於此節專論之。

有關唐末五代我國對外海上交通之興起，論者每謂與唐末黃巢之入廣州(八七九)有重大關係。在黃巢之亂以前，掌握中外海上貿易者多為阿拉伯人，黃巢入廣州殺「蕃」商十二萬人，後來外商視為畏途，國人遂起而代之。⁵²然出海販易者

50 宋史卷四八九勃泥傳同。

51 碑原為阿拉伯文，馬克恩中譯。譯文載吳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頁六。此處轉引自蘇宗仁，宋代泉州市舶司研究(香港大學碩士論文，一九五〇年)，頁三七二。

52 黃巢殺蕃商事，見阿拉伯人馬素迪(Abu-I-Hassan Ali-el-Masudi)著「黃金牧地」，並云蕃商遂止於馬來半島上之Kalah貿易。此論點見方豪，「宋泉州等地之祈風」(修訂後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冊)，頁一二三〇。

，仍多為嶺南道人，福建地區則尚未見。因此論及泉州在五代後在海外交通中所占地位逐漸重要，還要從其他方面探討。論到五代、北宋時代泉州對外交通轉盛的原因，至少可由以下三方面加以討論：其一是主觀形勢的改變，即福建（尤其是泉州）商人的興起，在對外貿易中逐漸掌握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次是客觀形勢的逐步成熟，這包括東洋航路之肇興與西洋航路之轉變兩方面。其三就是航海技術的重大進展。茲分別論述於後。

一、主觀形勢之改變——閩（尤以泉州為最）商之興起：

前已論及在唐中期以前，來往中阿間從事海上貿易者，多為阿拉伯（大食）人，後來稍有改變，中國人出海貿易者漸多。但其時出海販易者多為嶺南道人，至五代起形勢始變，閩商出海販易者日盛一日。此種轉變的理由，復可由以下幾項分別說明：

1. 福建之地狹人稠：以今日地理區而言，福建屬浙閩丘陵區，多山嶺丘陵，海拔在四〇〇～一五〇〇公尺之間，位於大陸邊緣，為火山噴發物堆積而成；地形破碎，河流短促，且均獨流入海，故僅有局部沖積平原，可耕地不多⁵³。而隨着人口的增加，閩地逐漸變為地狹人稠，出產不足的現象。這種地理因素，至今已成為國人論閩粵華人出海維生之重要理由。但此處所需決定者是此種地狹人稠現象由何時開始。在南朝陳時，晉安郡尚為糧食過剩之區⁵⁴。唐末韓愈謂「閩越地肥衍」⁵⁵，沈懷遠「次綏安」（今漳浦縣）詩亦云「閩方信阻狹，茲地亦豐沃。」⁵⁶是可見在唐末以前「阻狹」是不錯的，但因「地肥衍」，尚無糧產不足之現象。因此此種現象之產生，當在五代宋初以後。這與五代北宋時期福建及泉州地區的開發有重大關係。

五代、北宋時期在福建及泉州地區之開發史上居於關鍵地位。就福建地區而言，宋初是單獨設置地方最高行政區（路）之始。福建地區在五代以前，或屬嶺南，或屬江南（東道），至宋，於收入版圖後即單獨設路，漳泉未附前先稱兩浙西南路，太宗雍熙二年（九八五）起更名福建⁵⁷。福建之於宋初設路，是因為唐末五代以

53 參何敏求、陳壽、程璐，中國地理概論（正中，民二五），頁三一～三。

54 陳書卷三五陳寶應傳載：「是時（指侯景之亂），東境饑饉，倉積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並皆自賣。而晉南獨豐沃。寶應自海道寇臨川、永嘉及會稽、餘姚、諸暨，又載米粟與之貿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並奔歸之，由是大致資產，士家強盛。」其時晉安郡之富庶可見。

55 引自大明一統志，卷七四，福州府形勝條。

56 沈懷遠有謂係南朝宋人，實誤。輿地紀勝，漳州府條有「唐沈懷遠碑」（咸通二年，九六一）記載，明謂其係唐末人。

57 詳見宋王存，元豐九域志（文海出版社影印乾隆校刊本），卷九，福建路，頁一。

來中原人士的大量移入，使州縣人口大量增加，偏僻荒蕪之區有更進一步的開發，在五代時就已有許多地區因發展已達相當程度而設縣。以泉州地區而論即有五個之多：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八〇三）置之大同場，在五代閩王曦永隆元年（九三九）升為同安縣；唐穆宗長慶二年（八二二）置之桃林場，在五代後晉長興元年（九三〇，時王審知治閩，未稱帝）升為永春縣；唐懿宗咸通五年（八六四）置之小溪場，在五代南唐保大十三年（九五五）升為清溪縣（次年更名為安溪）；同年，唐僖宗乾符三年（八七六）置之武德場亦升為長泰縣（以上四縣俱由南安縣分出）；宋初太平興國六年（九八一，即併有泉州之第四年）又劃晉江縣洛陽江北地區成立惠安縣⁵⁸。是泉州由唐原有之四縣（南安、莆田、仙遊、晉江）增為九縣。由縣邑增置之快、之多，可以明顯看出唐末五代以來泉州地區開發之迅速。因此宋領有福建後，即對福建之行政區劃做了大幅度的調整，由原來之五州（福、建、泉、汀、漳）擴為八州（軍），上四州之建、南劍、邵武（軍）、汀及下四州之福、興化（軍）、泉、漳。而原屬泉州不在晉江流域範圍內的莆田、仙遊劃歸興化軍，長泰劃歸漳州，而原屬福州之德化則劃入泉州，即泉州新領之七縣全屬晉江流域，與地理區域更相符合⁵⁹。至此泉州之轄域大體定型，其後終清之世未有重大改變。

這種快速的開發，自然與人口之快速增長有莫大關係。緣唐中期中原已遭安史之亂的摧殘，人口流徙來南者已不少；唐末復經王仙芝、黃巢之亂的殺戮，中原更加殘破不堪，入閩仕民更為眾多。王潮、審知、審邽兄弟入閩的一支即為最大的一次⁶⁰。嚴耕望先生由文獻通考及宋史所載後周及各國各地之戶數，統計出五代之末全國戶口以漳泉、吳越及南唐為最稠密⁶¹。自隋到南宋初年福建人口增加的情形可由下表看出：

年	代	戶	數	口	數	資	料	來	源
隋		一二、四二〇		(未載)		隋書	卷三	一	地理志
唐	初	一五、三三六		二二、八二〇		舊唐書	卷四	十	地理志

58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文海出版社影印嘉慶刊本）、元豐九域志、宋史皆作太平興國六年。而歐陽忞，輿地廣記（文海出版社影印士禮居本），卷三四，頁三，則作淳化五年（九九四），疑誤。

59 有關五代宋初福建、泉州之州縣沿革，詳見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二，江南東道泉州、漳州條。

60 至今閩南大姓族譜均謂其族在唐末入閩，如鄭、林、黃、陳等。閩南一帶亦有傳言，謂隋王潮入閩之兵丁，將原來男子都殺了，娶他們的妻子為妻，所以女人叫做「諸傳人」，意即無諸傳下來的人。男人叫做「唐補人」，意即外來的唐人。唐末王氏入閩在福建移民史上的意義可見。詳見王孝泉，「從地理、民族、學術的變遷說到研究福建文化的途徑」（福建文化一集三期，一九三二・四），頁四～九。

61 詳見中國歷史地理（華崗），嚴耕望著，隋唐五代十國篇。

唐開元時	九〇、六八九	四一一、五八七	舊唐書卷四十地理志
唐天寶時	八三、五三八	五三七、四七二	通典卷一八二州郡十二
天寶年間	八四、三一	(未載)	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九江南道五
元和時	八六、〇七九	(未載)	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九江南道五
宋太平興國年間	四六七、七八五	(未載)	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二
元豐三年	九九二、〇八七	二、〇四三、〇三二	文獻通考卷十一戶口考
元豐年間	一、〇四四、三三五	(未載)	元豐九域志卷九
宋紹興三十二年	一、三九〇、五六五	二、八二八、八五二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

如以唐天寶時(七四二~五六)與宋元豐三年(一〇八〇)比較,戶數增加近十二倍,口數增加近四倍,人口增加之多,已可大略看出。至於泉州人口的增加,下表亦可顯示一斑:

年 代	戶 數	口 數	資 料 來 源
唐開元時	三〇、七五四	(未載)	元和郡縣圖志、乾隆泉州府志載三七、〇五四,未知孰誤。
天寶時	二三、八〇六	一六〇、二九五	舊唐書卷四十地理志五
天寶時	三五、五七一	(未載)	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九
乾元時	三三、八〇〇	(未載)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八戶口志
元和時	二四、五八六	一五四、九〇〇	通典卷一八二州郡十二泉州府志載戶三五五〇〇有奇
宋太平興國時	九六、五八一	(未載)	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二江南道
元豐時	二〇一、四〇六	(未載)	元豐九域志卷九,宋史地理志載崇寧時戶同。
淳祐時	二五五、七五八	三四八、八七四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八

由唐元和年間(八〇六~二〇)至北宋元豐時,戶數增加達八倍之多,成為當時全國戶數在二十萬以上有數的大州之一⁶²。雖然宋後浮報戶數以逃稅之風氣極盛,但唐末到北宋末年,泉州人口增長之速是大概可以看出的。

這種人口快速的增長,遂造成宋初以後泉州地狹人稠,生產不足的現象。宋史

62. 戶數在二十萬以上之州有:潭州、汴州、京兆(長安)、杭州、吉州、洪州、福州及泉州等,戶數俱見元豐九域志。程瀚洛,「宋代城市經濟概況」(歷史教學,一九五六年五月號)言戶數二十萬以上者僅有六州,不實。

卷八九地理志福建路條載：

民安土樂業，川原浸灌，田疇膏沃，無凶年之憂。而土地迫狹，生籍繁夥，雖磽确之地，耕耨殆盡，畝直寢貴，故多田訟。

已說明福建雖土地肥沃，無凶年之憂，但却因地狹人稠，而使地價騰貴。而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八戶口志更謂在宋真宗時福建、兩浙已因地狹人貧，至人多終身傭作，無力繳納丁錢：

（宋）真宗之世，念南方地狹人貧，終身傭作，僅了身丁，其間不能輸納者，父子流竄，甚或生子不舉。祥符中下兩浙、福建除身丁錢四十五萬貫。其時漳、泉、興化三州，以丁錢折變輸米，無爲論奏者，除錢詔令遂不行於三郡。

至南宋初年廖剛的投省論私買銀割子時，已至「七閩地狹人稠，爲生艱難，非他處比」的境地⁶³。

福建既因地理環境所限，可墾之地有限，而人口又如此大量的增加，自然造成地狹人稠，生活困難的情形。農產不足，遂迫使閩人紛紛出海，從事海外貿易。北宋熙寧間歷官興化軍的泉州惠安人謝履「泉南歌」云：

泉州人稠山谷瘠，雖欲就耕無地闢，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⁶⁴就是最好的說明。

2. 寺田的集中：福建人稠的因素固在唐末五代逐漸形成，但如無其他因素之推波助瀾，人口過剩現象猶不至太過嚴重。但唐末五代以降，福建佛教勢力之大量擴張，遂使原已地狹人稠的局面，更形惡化。

唐中葉起，南禪在江南如日中天。福建由青原行思第五世雪峯義存受王審知禮遇，以福州爲傳法之地後，亦開始大盛⁶⁵。有關寺廟之建築，五代時期數量之多不但空前，而且絕後。清同治重纂福建通志卷二六四云：

閩自建安立郡以來，一切建置不詳，獨佛寺爲最古：紹因、林泉、延福創於

⁶³ 見廖剛，高峯文集（四庫珍本初集），卷一。此外，方勺，泊宅集（讀書齋叢書本）卷中亦云：「七閩地狹瘠，而水源淺遠，其人雖至勤儉，而所以爲生之具，比他處終無有甚富者，墾山隴爲田，層起如階級然」。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農田條亦謂：「淳熙元年十有一月，余瑞禮、鄭僑言『福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俱可見。

⁶⁴ 見輿地紀勝，卷一三〇，福建路泉州府條載謝履「泉南歌」。

⁶⁵ 有關佛教在福建的興盛，可閱竺沙雅章，「唐五代における福建佛教の展開」（佛教史學七卷一號，一九五八・二），頁二四～四五。及「宋代福建の社會と佛教」（東洋史研究十五卷二號，一九五六・十），頁一七〇～六二文。黃敏枝，宋代寺院經濟的研究（臺大歷史所博士論文），第四章宋代福建的寺院與社會，亦可參考。

晉；資福、建福創於齊；蕭梁之際，塔既驟增，浮屠相望；陳、隋及唐，以數百計；王氏入閩，度僧三萬，增寺二百六十七，稱佛國焉。

已經說明了五代在福建佛教史上的地位。魏應麒曾經統計在王氏入閩前（八八五），自晉太康間（三八〇～九）福建有僧寺以來六百年間所建寺觀，不滿三百二十。而由王氏入閩至滅亡（八八五～九四五）首尾六十二年中，竟達三百三十七所之多。而自閩亡至宋統一（九四五～九七七）的三十三年間所建寺觀之數，也有一百四十一所⁶⁶（十國春秋卷九十更載有二百二十一所之多）。至宋時泉州遂有「泉南佛國」之稱，曾鞏元豐類稿卷四九佛教條載：

開寶中，令僧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歲度一人，以誦經五百紙為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尼未有度者萬數，天子震駭，遂下詔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餒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無轉死之民。

泉州僧之未度者，即以萬數，泉州佛教之盛可知。

佛教大盛，寺廟衆多，在寺領莊園不斷的擴張下，原已地狹人稠的福建地區，農業問題更形嚴重。十國春秋卷九一惠宗本紀云：

天盛三年（九八二）冬十二月，度民二萬為僧，由是閩地多僧。王（延鈞）之量田土為三等，膏腴上等以給僧道（原註：因有寺田之名），其次以給土著，又其次以給流寓。⁶⁷

泉南雜誌卷下亦謂：

泉至五代之際，腴田多屬寺觀，民間其下者耳。

閩書卷三九版籍志更稱：

偽閩之量田土，第為三等，膏腴上等以給僧寺，此寺田所由起也。其後王延彬、陳洪進及諸家多有田入寺者。顧竊喜施之名，多推產米於寺，而以輕遺其子孫，故寺田產米，比民業獨重。

都可以看出五代以後佛教寺田勢力之大，尤以後兩段所載專指泉南而言，更值得重視。至其確實所占農田之比例，黃敏枝曾由淳熙三山志統計宋代福州的情形，據其

66 詳見魏應麒，「五代閩史稿之一——宗教與神話」（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七集第七六號），總頁三〇〇五，以三表分別列出此三時期之所有寺觀。黃敏枝也由福建通志統計謂「五代以前佛寺極少，唐懿宗時一〇二所，僖宗時有五六所，昭宗時更減至十八所，但閩時代增至二六七所。九四五年併入吳越後，迄九七八年納土降宋止，三十二年間又新建二二一所，合建達七八二所之多。」見黃著，前引文，頁一九六。

67 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農田條謂「初，閩以福建六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給僧寺、道院，中下者給土著、流寓。」亦同。

統計，福州寺田山地竟占全州田地百分之二十點九，而寺戶僅占全州百分之零點四六⁶⁸，土地集中於寺廟的情形可知。閩南漳、泉一帶雖無詳細資料可供統計，但據南宋中期人陳淳的說法，泉南一地寺田所產竟占全額十分之七，其產多至八、九千，甚至百千，歲入以萬斛計，富寺有田一百五十頃，極為平常，而富家不過五頃、十頃而已⁶⁹。而漳州寺產所占比例，更高達七分之六⁷⁰。難怪陳淳對寺觀要大肆抨擊。

原已地狹人稠的局面，復因佛教寺院之剝削而問題更形嚴重，是以迫使閩省百姓出洋貿易者，實與上述人口之增長及寺田之大量膨脹有不可分的關係。由這種情形所造成的農業剩餘人口，在原本已具有海上經驗的沿海州縣社會中，轉向海上發展的可能性自然極大。他們在唐末受到外商來販獲得重利之引誘，逐步走上出海貿易的路，復遭遇五代特殊環境的孕育（詳下），入海商賈人數大量增加，至宋初已造成一股不可阻攔的海上力量。這是日後閩南泉漳一帶社會中特重貿易取向（Trade-orientation）的原因。後村先生大全集卷十二「泉州南廓」二首把這種現象說的最為明白：

閩人務本亦知書，若不耕樵必業儒。惟有桐城南郭外，朝爲原憲暮陶朱。

海賈歸來富不貲，以身殉貨絕堪悲。似聞近日鷄林相，不博黃金不博詩。

其始在唐宋之際，而絕非如某些學者所謂在明中葉以後也⁷¹。

3. 五代福建地區割據的影響：有關這一點，於前述五代時期泉州對外海上交通中已約略提及，至少有兩方面對閩商大量出海從事貿易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其一是五代割據期間之主政者，前之王氏，後之留從效、陳洪進，皆對海外貿易頗爲鼓勵。他們鼓勵對外貿易的原因，雖無具體史料可查，但與地狹人稠，農業生產不足，而海外貿易能獲取暴利，可能有關。其中尤以王審知之「招來海中蠻夷商賈」及其侄王延彬在泉州積極從事對外貿易，號「招寶侍郎」爲最重要。他們對海外貿易的鼓勵政策，大有異於傳統中國的價值取向，是造成日後福建沿海地區與中原傳統文化有重大差異的重要原因。福建僻處我國一隅，在「天高皇帝遠」的局面下，原

68 黃敏枝，前引文，頁一九七～八。

69 見陳淳，北溪大全集（四庫珍本四集），卷四四，「上趙寺丞論拜提令」，頁三。

70 同前書，卷四三，「擬上趙寺丞改學移貢院記」，頁一〇。

71 有關閩南社會之貿易取向，過去學者因探討明清以後閩粵之移民海外，均謂此種取向在明中期後始形成。事實上如追溯其根源，自唐末以降，此種形態已逐步形成，故絕非在明末才形成。詳見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長沙商務，民二七），第一部份。許烺光書評（載人文科學學報第一期，昆明，民三二·六）已說明閩南社會在明末並非由傳統農業社會直接走向海外貿易，而以僑鄉中農業人口只占十分之五，商業人口已占十分之三，說明其早具商業之傳統。而近人之著作，均沿襲前人之說，而未曾溯其本。如林麗月，「閩南士紳與嘉靖年間的海上走私貿易」（師大歷史學報八期，民六九）一文即是。

本就容易造成與中原文化歧異的現象。加之五代時統治閩地的君主又為傳統下層社會出身，其文化與上層文化容有不同。商業在傳統中國社會中雖被視為最低的一種職業，但五代君主則多持鼓勵商業的政策，遂使商業在福建地區的社會中占重要地位，終至造成福建偏重貿易的價值取向⁷²。至宋再度統一中國時，此種取向已根深蒂固，難作更改。周起元謂：「自王審知招航海之商，而閩人泛粵以轉市於夷」⁷³即已說明王審知之鼓勵商業政策，造成閩人從事海上貿易之習性。

其二是割據的局面改變了閩省海上貿易的型態。原來閩商出海貿易例須經過廣州往南海，明州往韓、日，因閩省之割據，其與粵之南漢，浙之吳越俱為仇敵，無法再經由廣州及杭、明諸州的轉運，因此由王氏入閩起，福建割據者皆直接泛海由登、萊入貢中朝，而閩人亦直接與新羅、高麗往來。南海所出產的香藥珍寶也大量匯集於泉州。此種變過去間接來往為直接往來，是日後宋政府雖未置司泉州，而閩南商客仍能由泉州直接放洋，北往高麗、日本，南去南海之最重要因素。

以上三點理由，是泉州能由唐末廣揚間中途站轉而成為獨立對外貿易之港埠的重要原因。福建泉州地區，雖然僻處東南沿海，腹地狹小，與內陸交通又極不便，但終在閩商（大部為泉州商）在五代後之興起，掌握了大部分對高麗貿易及部分對南海貿易後，逐漸成為我國對外交通中的新興港市。這是宋初泉州對外交通繼續發展的首要主觀因素。

二、客觀形勢之逐漸成熟—東、西洋航線之重大轉變：

在五代宋初閩商逐步抬頭後，客觀形勢的演變亦逐漸有利於泉州，這可由兩方面論之。一方面是西洋航路的轉變，一方面是東洋航路的興起。

東西洋一辭，雖至元初始見於記載⁷⁴，但由於它是南海貿易地區不斷擴大下的產物，因此在宋時應該已經存在。原來我國與南海之貿易只限於與位於廣州西南方之國家的交易，是故在初期（約在魏晉以前）沿岸航行時期，外人來華率以交州為門戶。待其後航海術有所進步，掌握了南海季風之秘密，商賈於穿過麻六甲海峽後漸敢越南海航行時，廣州才成為對外貿易的大商埠，此即隋唐時代廣州大盛之主要

72 參閱許烺光，「評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頁二〇七～二〇。

73 詳見東西洋考（國學基本叢書本），周起元序文。

74 我國史籍記載東、西洋名詞最早者，為元大德八年（一三〇四）陳大震所著南海縣志一書〔賴永樂大典殘本（二〇二冊）以存〕。詳見饒宗頤，「南海地名新商榷—據永樂大典新資料立論」（香港大學金禧紀念學術講座稿，一九六一）一文。饒氏著作原為英文，著者未見，其論點轉見於吳景宏，「元代中菲關係之探討」（大陸雜誌三三卷十期），頁三〇六～七。吳氏雖不知南海縣志一書，但在「十六世紀以前之中國與南洋」（清華學報十一卷一期）一文，頁一三七引汪大淵島夷志略，謂「東西洋名詞之構成，至晚當在元代以前」，其說極是。

原因。其時由廣州去南洋，率皆於冬季乘東北季風南下，即可抵達三佛齊（即室利佛逝，在今蘇門答臘之舊港 Palembang 一帶），其後由於闍婆（爪哇）渤尼（婆羅洲）以及在今菲律賓羣島的摩（麻）逸逐步開化，乃使南海與我國交往地區日漸擴大。這條由廣州順風南下之航線已無法到達上述新增的貿易地區，東西洋一辭遂逐漸出現。由廣州順冬季東北季風南下可及之區以西，謂之西洋，以東謂之東洋。如此說屬實，則東西洋之出現，應在北宋勃泥、闍婆、摩逸等國使臣來華後。而由於當時國人並未詳究冬季所吹係東北風，概以北風視之，因而對南海諸國在方位的辨認上，亦頗有偏差。宋洪遵《泉志》卷十二外國品下載：

三佛齊國錢。諸蕃風俗云，在廣州正南。

佛（勃）泥國錢。諸蕃風俗云，在廣州東南。

嶺外代答卷二海外諸蕃國條亦云：

（上略）正南諸國，三佛齊其都會也。東南諸國，闍婆其都會也。

事實上，佛泥（婆羅洲）、闍婆（爪哇）一線才在廣州之正南，而三佛齊已偏在廣州西南。此點證明國人對南海方位之辨認，全依貿易風爲之，由廣州順風所達之地，即爲正南，初不知因所吹爲東北風，故所到之地已偏在西南⁷⁵。但無論方位如何，如順冬季貿易風南下，可直達之地爲三佛齊，所謂東西洋亦以此分野。是故以廣州爲基點畫分東西洋，三佛齊應爲「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之地。元大德八年（一三〇四）陳大震《南海縣志》一書，爲「廣舶官本」，代表廣州人對南海之看法，稱單馬令（新加坡）與三佛齊爲小西洋，而佛泥（即勃泥）即爲東洋或小東洋，單重布羅（婆羅洲南部之 Tandjung）、闍婆爲大東洋，其以假里馬打（Karimata）海峽及巽他（Sunda）海峽劃分東西洋明矣⁷⁶！但由於宋後泉州之興起，至南宋泉州對外交通更有凌駕廣州之上的趨勢，其後終元末止，國人多由泉州出海，亦有以泉州爲基點劃分東西洋者。明萬曆年間張燮《東西洋考》卷五文萊條云：「文萊，即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論者皆謂東西洋分界線之由假里馬打、巽他海峽東移文萊，是一六一七年東西洋考一書問世後的轉變⁷⁷，事實上，這是不明瞭東西洋分界理由者所做的推論。張燮，漳州人，其所謂東西洋分界點，係代表閩南以泉州（明以前）或漳州（明中期以後）爲出發點之觀念，自然與以廣州爲基點的劃

75 有關此點，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有極精闢之見解。見氏著，「南洋を東西洋に分つ根據に就いて」（收入《アジア史研究》，冊四），頁五三三～五五。但其有關東西洋轉變說，則頗有疑問。

76 詳見吳景宏，前引文，頁三〇六～七。

77 如宮崎，前引文及許雲樵，「永樂大典中的南海資料」（《星洲日報》，一九六二年元旦特刊）等均持此說。

分不同。下述泉州、勃泥間航線在宋時的出現最足以說明這個道理。

1. 西洋航路之轉變——泉州、勃泥直接航線的開通：

兩宋時，三佛齊仍為東西交通之重要轉運站，**嶺外代答**謂其係「諸蕃水道之要衝」，**諸蕃志**更謂其「扼諸蕃舟車往來之咽喉」（**文獻通考**同）。由印度洋東來之船舶，在過麻六甲海峽後，要在此停靠，等待夏季西南風起再北來廣州，而其東之閩婆（爪哇）等國亦須先至三佛齊，或占城（越南南部），再來廣州。**嶺外代答**卷二三佛齊國條所謂：「東至閩婆諸國，西至大食諸國，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者」，即指此而言。但其間由於往返商旅之摸索、指引，漸亦有直接由閩婆來華之航線。**嶺外代答**卷三航海外夷條載：

（上略）三佛齊者，諸國海道往來之要衝也。三佛齊之來也，正北行，舟歷上下竺與交洋，乃至中國之境。其欲至廣州者，入自屯門，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門。閩婆之來也，稍西北行，舟過十二子石而與三佛齊海道合於竺嶼之下。

竺嶼在蘇門答臘南端都魯把旺港外，則由閩婆來中國雖利用一段三佛齊航路，但已不經三佛齊，這自是一條新的直接航路。但就閩婆與中國之地理方位言之，如閩婆利用夏季風來中國，則自閩婆西北行後再轉入三佛齊海路來廣州，反不如直接北航至我國東南沿海便利。故**嶺外代答**所述或只是諸航路之一。必另有航路可不經三佛齊舊路而逕至我國東南沿海。如前引**文獻通考**卷三三二閩婆條載其淳化三年（九九二）來貢云：

先是朝貢使泛海船六十日至明州定海縣。掌市舶監察御使張肅，先驛奏其使飾服之狀與嘗來入貢波斯相類。譯者言云：金（宋史作今）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數往來本國，因假其嚮導來朝貢。

閩婆既能直接來我國東南沿海，則居於其東北的勃泥自亦能來。同書勃泥條載其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來貢云：

其王向打遣使施弩，副使蒲亞里，判官哥心案（來貢）……（其表）橫讀之，以華言譯之云：勃泥國王向打，聞有朝廷，無路得到。昨有商人蒲盧歇船泊水口，差人迎到舟，言自中朝來，比詣閩婆國，遇猛風，破其船，不得去。此時聞自中國來，國人皆大喜，即造船船，令蒲盧歇導達入朝貢。

閩婆、勃泥來華直接航路之開通，無疑為往昔須經三佛齊轉運之一大轉變。閩婆、勃泥等來華既至東南沿海為便，終於有元豐五年（一〇八二）勃泥國使者要求由泉州放洋回國之事：

元豐五年二月，其（勃泥）王錫理麻諾復遣使貢方物，其使乞從泉州乘海船

歸國，從之。

其使要求從泉州乘海船歸國，說明了泉州——勃泥間之直接海路較廣州——勃泥之路要方便，蓋順東北季風也。勃泥、閩婆之來往泉州既較廣州為便，泉州商客南下者乃能另闢以勃泥為轉運站之新航線，泉州對外交通乃日盛一日。

2. 東洋航路之興起：

勃泥——泉州航線之開通，對東洋新興地區的貿易也有重大影響，蓋無須再經由三佛齊之轉運，而可由勃泥順風來泉州。今日中外史家多承認摩（麻）逸（Mait，即 Mindoro）屬菲律賓，而有關摩逸之記載初見於文獻通考卷三三二閩婆條：

又有摩逸國，太平興國七年（九八二）載寶貨至廣州。

此次來貢與前引五年勃泥之來貢有密切關係⁷⁸，宋史、文獻通考兩書勃泥條均言勃泥去占城及摩逸各三十日程⁷⁹，即初期摩逸等國來華先西南行三十日至勃泥，再北來廣州。其後勃泥既因風向之便，轉而由泉州歸國，摩逸當亦隨之。至南宋以後遂能直接由泉州往來貿易。

就東洋而言，來泉州既較廣州為便，復由於我國航海針路之運用（詳後），泉州遂成為我國交通東洋唯一之港埠。試比較南宋反映廣州對外交通之嶺外代答及敘述泉州對外交通之諸蕃志二書，即可明白看出。嶺外代答載海外諸蕃國云：

閩婆之東，東大洋海，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愈東則尾閭所泄，非復人世。稍東北則高麗、百濟耳。⁸⁰

值得注意的，是根本未提及勃泥及以東諸國。蓋元豐以後勃泥即由泉州往來，而閩婆仍由三佛齊來廣州，故存其名，却將閩婆視為最東之「人世」；其東則僅有傳聞中的女人國，再東則「非復人世」，可見南宋初年廣州對南海之了解，最東僅止於閩婆，對其東之東洋諸國鮮有所知。但反觀泉州，諸蕃志雖有抄襲嶺外代答處，然於述完西洋諸國後，接著敘述勃泥、摩逸國、三嶼、蒲哩嚕諸國，後更述流求國、毗舍耶國，才及於新羅、倭國⁸¹。可見泉州方面對今婆羅洲以東之東洋諸國，如菲律賓（麻逸、三嶼、蒲哩嚕等）、毗舍耶（Visaya Is.）、流求等由於商賈來往貿易，

78 詳見吳景宏，「五代兩宋時代中非關係之探討」（大陸雜誌三二卷二期），頁三八～四〇。

79 宋史卷四八九勃泥條：「勃泥國在西南大海中，去閩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皆以順風為則。」文獻通考同。

80 嶺外代答係南宋浙人周去非所作，以曾官桂林通判，返鄉後問嶺南事者甚多，書以代答，故名。該書自序署淳熙戊戌（五年，一一七八）。引見卷二（知不足齋叢書本）海外諸蕃國條。

81 諸蕃志為趙汝适所作，趙氏曾提舉福建路市舶，自序題寶慶元年（一二二五），唯書中頗多抄襲嶺外代答處，其以泉州市舶司之資料所載諸蕃已極完備，加上嶺外代答有而已所無者，反為蛇足之舉。如東洋引述周去非以傳言所載之女人國及沙華公國等是。

瞭解甚深。早於諸蕃志的雲麓漫鈔⁸²卷五有「福建市舶司常到諸國船舶」，記載的更明白：

（上略）勃泥國則有腦版，閩婆國則多藥物，占城、目麗、本力千、賓達儼、胡麻巴洞、新洲國則有夾煎。佛囉安、朋豐、達囉咩、達磨國則有木香。

波斯蘭、摩逸、三嶼、蒲哩嚕、白蒲邇國，則有吉貝布，貝紗。

自西而東依次敘述常到泉州諸國，自波斯蘭以下五國俱屬今菲島範圍，而其上接閩婆諸國，下接高麗一國⁸³，更可見泉州對東洋關係之深厚。泉州此種在南海貿易中兼通東西洋的優越地理位置，是我國其他港市難及的條件。更何況泉州還掌握了前述對東北亞高麗的貿易，這更使它成為南海（包括東西洋）與高麗之間的轉口港，泉州對外貿易焉能不盛。梁嘉彬先生說的好：

在泉州開港前，福州以北諸港係指定交通東海，其出帆係藉夏季西南信風（遇西風或南風尚可開航，遇西北或北風，則無開航之理），故易交通流求、日本、韓國。廣州以南諸港係指定交通南海，其出帆係藉冬季東北信風（遇東風或北風尚可開航，遇東南風或南風，則無開航之理），故易交通中南半島諸國。臺灣、菲律賓諸島因偏處南海之東，故每為東海航線，南海航線所輒脫。宋代泉州貿易大盛，航海術續有進步，而泉州港之出帆，一年祈風兩次（夏季西南風，及冬季東北風），兼通東海、南海諸國，由是臺灣、菲律賓諸島乃始航路暢通。⁸⁴

誠為此說最精要之結論。

三、航海技術的重大進步：

五代以後我國海上交通大盛的另一因素，厥為航海技術的進步。在唐末以前從事南海貿易者既多為阿拉伯人，故有關航海資料極少見於我國史籍。至五代以後情況大變，華商既成為貿易常客，我國之航海知識亦隨之大為進步。其與泉州海外交通之發展有密切關係的有下列幾項：

1. 福建造船技術領先我國：五代以後閩商大量出海貿易，海舟為彼等所必備。在「唐末泉州的興起及其背景」中，已論及自古福建地區即有製造海船的傳統，自此以後造船技術續有重大的進步。其時福建地區的海船建造，多為民間造船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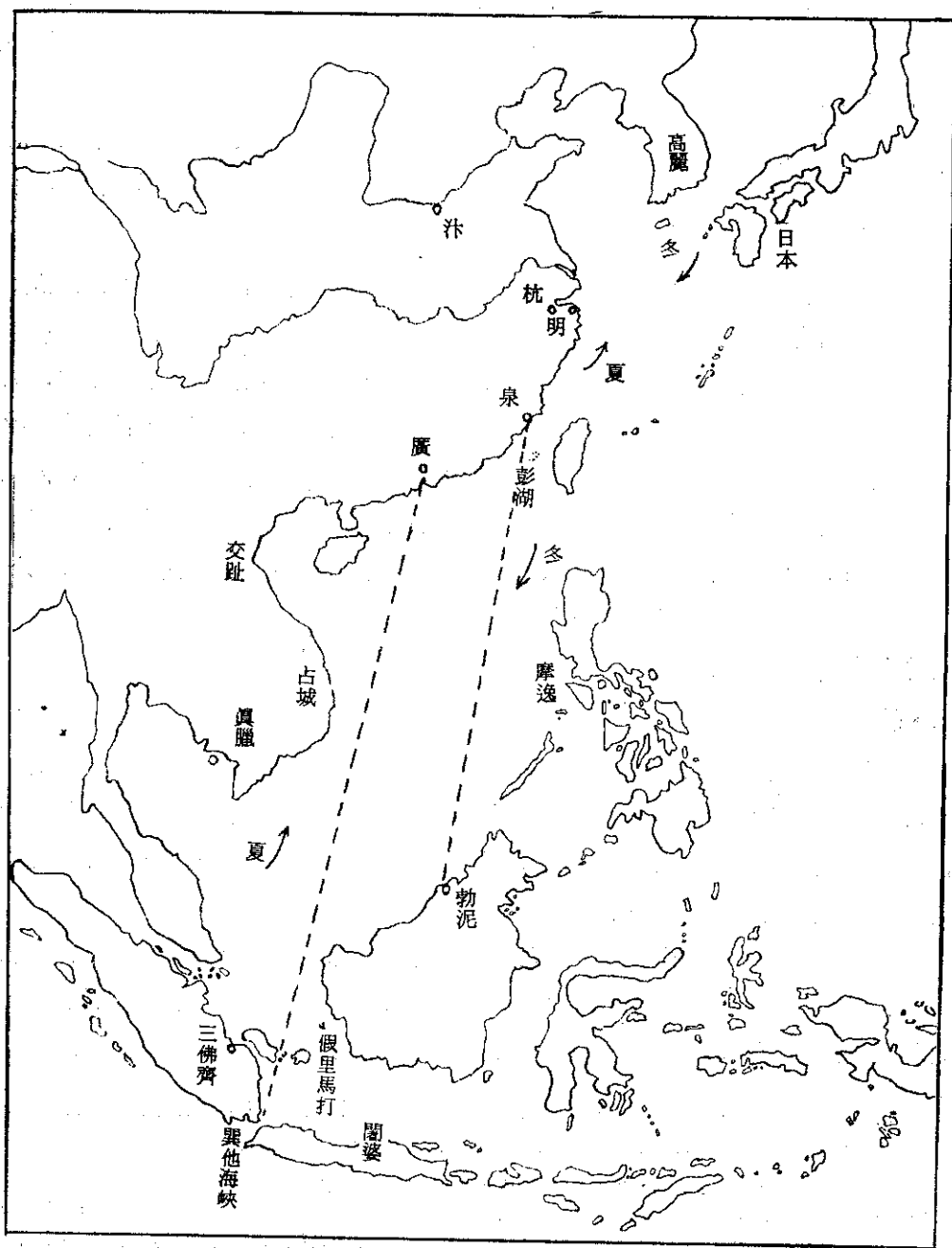
82 趙彥衛雲麓漫鈔版本極多，有四卷本（如筆記小說大觀本）及十五卷本（如涉園梓舊本），前者無此段，後者始有。今據涉園梓舊本。該書自序署開禧二年（一二〇六）是早於諸蕃志。

83 以上有關中非交通之論述，均參閱吳景宏，「五代兩宋時期中非關係之探討」一文。

84 見梁嘉彬，「論隋唐流求與琉求臺灣菲律賓諸島之發現」（學術季刊六卷三期，民國四七、十二、三十一），頁九七。梁氏其他著作亦屢言此點，見氏著，流求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東海大學，民五四年）一書。

迄宋室南遷止，少見官方在福建設有造船廠），完全是在繁盛的對外貿易中滋生成長，與其他地區為官方經營者，大為不同。如宋會要刑法二之一三七載南宋嘉定五年（一二一二）九月二十八日臣僚言：

漳、泉、福、興化，凡濱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備財力，興販牟利而已。



東西洋與泉、廣位置比較圖

而宋初成書的太平寰宇記中，泉州土產項下即有「海舶」一項，則造船業在宋初即已為泉州主要製造業之一。而福建地區所造之海船為最佳。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七六云：「海舟以福建為上。」忠穆集卷二更云：「南方木性與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為上，廣東、西船次之，溫、明州船又次之。」宋會要食貨五〇之十八載紹興二十八年七月二日福建路安撫轉運司更言：

昨准指揮令兩司共計置打造出戰船魚船一十隻，付本路左翼軍統制陳敏水軍使用。契勘魚船乃是明州上下淺海去處，風濤低小，可以乘使，如福建、廣南海道深濶，非明海洋之比，乞依陳敏水軍見管樣，造尖底海船六隻，每面濶三丈，底濶三尺，約載二千料，比魚船數已增一倍，緩急足當十舟之用。詔從之。

可見兩浙路明州一帶因「淺海去處，風濤低小」，所適用之戰船魚船是不能用於「海道深濶」的福建、廣東海面，而要就地造更大的戰船。粵人出海則多用廣東所造之藤舟，據嶺外代答卷六藤舟條載：

深廣沿海州軍，難得鐵釘、桐油造舟，皆穿板穿藤約束而成，於藤縫中以海上所生茜草乾而塞之，遇水則漲，舟為之不漏矣。其舟甚大，越大海商販皆用之。

又據萍洲可談卷二所記廣州之船謂：

船方正若一木斛，非風不能動，其檣植定而帆側掛，以一頭就檣柱如門扇，帆席謂之加突，方言也。

廣船方正，不利破浪，而藤舟雖不至漏水，但難禦風濤，皆有缺點。福船據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二泉州風俗條則載：「船頭、尾尖高，當中平濶，冲波逆浪，都無畏懼，名曰丫烏船。」⁸⁵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載由福建徵來之客舟，對福船的描寫更為詳細：

（客舟）長十餘丈，深三丈，濶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攙疊而成。上平如衡，下側如刃，貴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其中分為三處，前一倉不安艫板，唯于底安竈與水櫃，正當兩檣之間也。……船首兩頰柱，中有車輪，上綯繩索，其大如椽，長五百尺，下垂釘石，石兩旁夾以二木鉤……遇行則卷其輪而收之。後有正桅，大小二等，隨水淺深更易。當檣之後，從上插下二棹，謂之三副檣，唯入洋則用之。……每舟十艫……大檣高十丈，頭檣高八丈。

85 本文各點大體依據王曾瑜，「談宋代的造船業」（文物，一九七五年第十期），頁二五一文寫成。

這種二千料的大船由於晚近泉州灣宋代海船的出土，得到了印證。泉州灣后渚港出土的海船，係南宋末年的海船⁸⁶。長三四·五五公尺，寬九·九公尺，深三·二七公尺⁸⁷，換算為長十丈多一點，寬三丈左右，深不及一丈（指船舷以下）；故其應為一千料至二千料的大船，即載重千石至兩千石，合六十噸至一百二十噸⁸⁸。而其特點：長寬比小，尖底，多隔艙，多重板及雙桅等，除甲板以上朽壞無從稽考外，餘均與高麗圖經所載大體相符，是可見宋代泉州造船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因此官方出使高麗常向福建徵調船隻：

舊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兩浙監司顧募客舟，復令明州裝飾，略如神舟，具體而微。⁸⁹

出使高麗，不就近於山東徵調，而委福建、兩浙監司招募，即可看出福建造船確有過人之處。

除了海船的出土以外，晚近泉州亦發現了古代船塢的遺址，在泉州東南位於法石鎮沿海的烏墨山澳、鷄母澳一帶，掘出了零星的船板、船舵或船索；民國四十七年更有船桅的出土，都說明了此地為昔日的造船之所⁹⁰。宋代泉州造船業之盛，不只有文獻資料的記載，更有出土的實物為證，故泉州造船駕於其他地區之上是顯而可見的。

2. 祈風所顯示對風向之控制及利用：五代宋初以後，泉州對外交通興盛的原因，除了造船技術領先外，航海知識的進步，也佔極重要的地位。緣泉州位於我國東南沿海中段，正居於海岸線由東西向轉為南北向之轉折點。此種優越之地理位置，加上對我國南方沿海一帶季候風之善於利用，遂使其成為我國兼通日、韓與南海之唯一港市。宋代泉州市舶的祈風，就是對季候風的利用已達極高程度之最佳說明。

我國沿海有極規律之季候風（或稱信風、汛，後因來往商賈多乘之往來，亦稱

86 詳見泉州灣宋代海船發掘報告編寫組，「泉州灣宋代海船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五年第十期），頁一～八，認為係宋末海船。陳高華、吳泰，「關於泉州灣出土海船的幾個問題」（《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四期），頁八一～二，雖言「船沉於至元十四年秋」，但亦承認該船在「宋末就已建成下海」，而定其建造年代在宋亡前三年。兩說雖有不同，但可肯定是南宋末所造的船。

87 見泉州灣宋代海船復原小組、福建泉州造船廠，「泉州灣宋代海船復原初探」（《文物》，一九七五年第十期），頁二八～三五。

88 前引「復原初探」謂其為載重二百噸之大船。陳高華、吳泰文則認為係一千料至二千料之船，即載重六十噸至一百二十噸之船，後說為是，前說有問題。

89 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國學基本叢書本），卷三四，海道一，客舟條。

90 詳見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調查組，「泉州塗關外法石沿海有關中外交通史跡的調查」（《考古》，一九五九年第十一期），頁六一～二。

貿易風），在南海方面，冬季吹東北風，夏季則吹反向之西南風。唐時蕃商來廣州貿易，多乘夏季西南風來華，乘冬季東北季風南返。能了解季風之秘密，進而運用其做最有利航海之安排，是唐以後中外海上交通大盛的重要原因。此種季風秘密，由阿拉伯人傳來後⁹¹，國人亦逐漸了解，華商出海販易者亦漸知利用，而終於發展出地方官及掌管市舶官吏祈風之舉。在泉州方面，季風可以利用的價值更大。冬季東北季風對從事南海貿易諸港，如廣州而言，是蕃舶南返時，故一年中僅夏季為貿易季節，一入冬令即無蕃舶再來。而交通東海諸港則反是，華商類皆乘夏季西南季風赴日、韓，而乘冬季東北季風南返；是夏季為淡季，而冬季反為貿易旺季。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云：「舟行皆乘夏至後南風，風便不過五日即抵岸焉。」故宋商抵達高麗多在七、八、九月，乘西南季風也。回航則以十月、十一月為宜，以利用東北季風。泉州位於我國海岸線之轉折處，遂可兼營兩地之貿易，冬季一方面有華商、蕃商往南海貿易，一方面有赴東北亞貿易者（尤以高麗為最，見前）返來；夏季一方面有南海商客入港，一方面又有赴東北亞者出海；一年中幾無淡季可言。前引趙彥衛雲麓漫鈔所載福建市舶司常到諸國船舶所云：「以上船舶（南海）候南風方向，惟高麗北風方向。」就是泉州兼通南海、東北亞貿易之實況，也是它能逐漸凌駕廣州之上的根本原因。宋代泉州一年祈風兩次，正是最好的說明。

說到祈風，唐時廣東蕃商來華已知利用信風，懷聖寺尚有阿拉伯蕃商祈風的儀式，南宋方信儒南海百詠記其事云：

番塔，始於唐時，曰懷聖塔，輪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絕無等級，其穎標一金鷄，隨風南北，每歲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絕頂，叫佛號，以祈風信。

岳珂程史亦云：

紹熙王子，先君帥廣，余年甫十歲，嘗遊焉。……後有宰堵波，高入雲表，式度不比它塔。……歲四、五月，舶將來，尋獠入於塔，出于寶，啾嘶號嘯，以祈南風，亦輒有驗。⁹²

同教徒以四、五、六月南風將起時，有祈風之舉，明顯可見。而我國官吏後亦有祈風之舉，萍洲可談卷二載其事云：

船舶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風；來以五、六月，就南風。……廣帥以五

91 對季候風之了解，始於西亞。蓋印度洋上也有信風，風向同於南海。公元一世紀左右，羅馬水手已了解其中秘密，後由羅馬傳與波斯，波斯復傳給阿拉伯人。

92 方信儒宋寧宗開禧二年任南海尉，書即成於是時。岳珂，飛孫，紹熙壬子（三年）其父曾知廣州。彼等所述均親見或親聞，史料價值極高。雖藤田豐八否認懷聖寺始建於唐，但阿拉伯人在唐來華時已經了解南海季風之秘密，應無問題。

月祈風於豐隆神。

祈風應每年兩次，然所見廣州祈風資料，無論回教徒、官方均只言於五月祈「回舶風」（南風），除史料失載之可能性極大外，可能與我國市舶司只重外商來販，抽解以取重利，對海商之南去，並不重視，是以無祈風之儀式，而僅設筵遣其行。續外代答卷三航海外夷條所載：

歲十月，提舉司大設筵蕃商遣之，其來也當夏至之後，提舉司征其商而覆護焉。

所述就是這情形。所謂祈風，並非不知風向之季節變化，不過是祈神「使風之從律而不愆」⁹³，以後遂成例行公事；設筵遣商之事掩滅了冬季祈風之舉。至於泉州，則所見史料皆明言一年有兩次祈風——四月及十一月。泉州九日山祈風第三石刻（方豪所編訂）云：「舶司歲兩祈風于通遠王廟。」真德秀祈風文亦云：「一歲而再禱焉。」其他祈風石刻，在初冬者謂「遣舶祈風」（第二石刻），孟夏者則曰：「禱回舶南風」（第六石刻），均可明顯看出。不過迄今所見祈風石刻皆屬南宋⁹⁴，值得探討的是泉州祈風儀式究起於何時？北宋時是否已有？若有，是設置市舶司以後（元祐二年，一〇八七）才有？還是以前就有？有關此問題，方豪「宋泉州等地之祈風」一文，已有說明。方師以祈風石刻常見「修歲祀」（第一石刻）、「修故事」（第二石刻）說明第一石刻決非祈風開始之時。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山川二九日山條引南宋初李邕水陸堂記云：

泉之南安，有精舍曰延福，其刹之勝，為閩第一。院有神祠曰通遠王，其靈之著，為泉第一。每歲之春、冬，商賈市於南海暨番夷者，必祈謝於此。……車馬之蹟盈其庭，水陸之物充其俎，戕物命不知其幾百數焉。已而散胙飲福觴豆雜進，喧呼狼籍。有禪師慧遠遂以紹興元年尸是院……曰：吾教以殺牲為大戒……神許余以不殺，余將以是會以報神之功。

紹興元年（一一三一）在南渡後第五年，而其前已有祈謝通遠王之禮，是在北宋已有祈風之舉，應屬無疑。而方師更引閩書卷八方域志所載說明不但在北宋時已有祈風之舉，甚至在宋室設置泉州市舶司以前，已有祈風之舉：

93 真德秀語，見真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本），卷四九，祈風文。

94 泉州九日山宋代祈風石刻之最早者（第一石刻）為淳熙元年（一一七四），最晚者（第九石刻）為寶祐六年（一二五八）。見方豪，「宋泉州等地之祈風」（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冊），頁一二〇一～四六。宋晞，「宋泉州南安九日山石刻之研究」（學術季刊三卷四期，民四四），頁三二～五一；吳文良「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文物，一九六二年第十一期），頁三三～四七，均可參看。唯吳文錯誤極多，尤以將東峯崇寧三年八月方正叔等石刻，擅加「以遣舶祈風」字句而成祈風石刻（頁三六）為最誤人。宋晞在「吳文良『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讀後」（史學彙刊一期，民五七）一文，已辨明。

山麓有寺曰延福……水旱疾癘，海舶祈風，輒見徵應。宋時累封通遠王，賜廟額曰昭惠，其後迭加至善利、廣福、顯濟六字。風之祈也，蓋宋時泉有市舶，郡守歲以四月十一日（方師辨為十一月之誤）同市舶提舉，率屬以禱。宣和二年，提舉張佑陞辭，朝廷至頒御香詣殿焚之，其重如此。（又有廟）曰肉身王，姓陳名益，熙寧間西夏有警，詔求勇敢士，郡守辟益為巡轄官。元豐間，從守祈風，睹廟之靈，誓捨身為佐，遂植仗立化。僧泥益軀，別祠奉焉。

似乎不祇在市舶設置後之宣和二年（一一二〇）有皇帝頒香事，在市舶設置前之元豐年間（一〇七八～八五）已有祈風之舉。市舶設置前即有祈風之舉，其時海外交通貿易之盛，概可想見。

3. 羅盤應用於航海之重大貢獻——航海針路的出現：航海羅盤應用於航海，無疑為宋代海上交通大盛的重要原因之一。往昔我國舟子航海，所恃者除風向外，晝則觀日，夜則觀星，或以繩鈎取海底泥嗅之辨舟之所在。簡言之，即仗量星象以定方向⁹⁵。指南針應用於航海，則根本的改變了此種形態。

指南針應用於航海之始，已難稽考，唯北宋時已見於記載。萍洲可談卷二載：

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或以十丈繩鈎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在。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四半洋焦條亦載：

是夜，洋中不可住維，視星斗前邁，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

是指南針在北宋哲宗元符二年至崇寧元年（一〇九九～一一〇二）或父服知廣州時，已用於航海。在其前有關指南針之製法亦已見於其他載籍⁹⁶。指南針應用於航海，使得已知利用季風之我國舟子得到最精確之方向指示器。原來此時航海技術已極進步，船舶順風入洋，風向變化，除當頭風外，均可以調整帆篷之方向，以順風勢繼續航行。萍洲可談卷二所謂：「海中不惟使順風，開岸就岸風皆可使，唯風逆則倒退爾，謂之使三面風，逆風尚可用，可石不行」（疑有脫誤）即指此而言。前引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四客舟條所載更詳：

大檣高十丈，頭檣高八丈，風正則張布帆五十幅，稍偏則用利篷，左右翼張，以便風勢。大檣之巔，更加小帆十幅，謂之野狐帆，風息則用之。然風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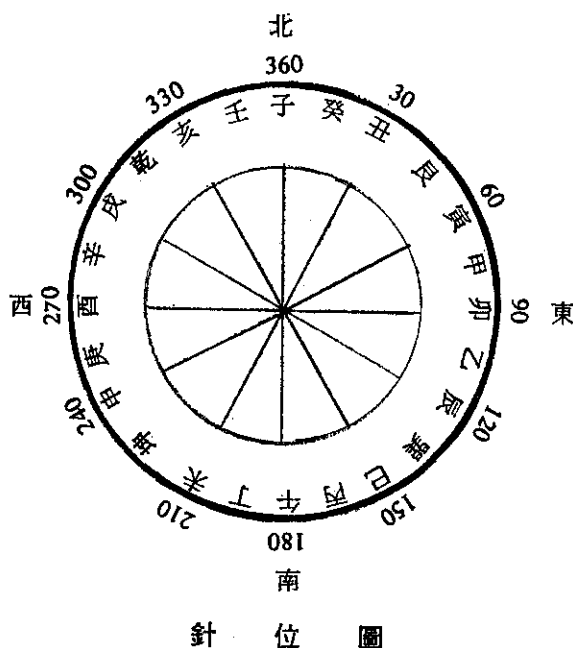
95 木宮泰彥著，陳捷譯，中日交通史第十一章日本與北宋之交通（頁二八三）言宋商赴日「惟據天星以定方向」，唯未見注明出處。

96 如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四；曾公亮，武經總要卷十五等均載有。詳參徐玉虎，「鄭和時代航海術語及名詞之詮釋」（收入明代鄭和航海圖之研究，臺北學生書店，民六五），頁二二～七。

八面，唯當頭不可行。……大抵難知正風，故布帆之用，不如利篷翕張之能順人意也。

更可看出航行除當頭風外，餘皆可用，祇要有更精密之方向指示，航海範圍當不限於順風濤可至之處⁹⁷。因此往昔不順風濤，海路又稱凶險之處，海船亦能仗恃針路之指引，御風前往，上述東洋航路，出現泉州直航摩逸、三嶼等地（均在今菲律賓羣島）的直接航線，就是最好的例子。雖然迄今能見之針路（或稱海道針經）最早僅能上推至明初鄭和航海圖，但宋代史籍中已有用針盤定方向的記載。諸蕃志卷上闍婆國條云：「闍婆國，又名莆家龍，於泉州為丙巳方。」丙巳方位於一五七·五度處（見附圖），並不合於今爪哇之方位，其係得自航海舟子配合東北風之風向，所修定之航行方向是顯而可見的。其後航海既以針路為主，星象為輔，泉州對外交通遂得以開闢更多新的貿易地區。

宋代閩南造船技術在我國既居首位，對風向之掌握又臻成熟，復因指南針用於航海，成為航行之利器，新闢諸航線（主要指東洋航線）於泉州又最為方便，泉州對外交通在五代以後愈來愈盛，是絲毫不足為奇的事。



97 如澎湖落漂之傳說。元史卷二一〇瑠求傳云：「（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澎湖諸島，與瑠求相對，亦素不通。天氣清明時，望之隱約，若煙若霧，其遠不知幾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澎湖漸低，近瑠求則謂之落漂，漂者水趨下而不同也。凡西岸漁舟到澎湖已下，遇颶風發作，漂流落漂，回者百一。」前引嶺外代答載闍婆以東，亦有類似說法。

第四節 泉州市舶司之設置及其後泉州的對外交通

一、福建市舶司的設置：

前幾節已經說明了泉州在宋初雖未設置市舶司，但閩南（泉州商居多數）却始終未曾中斷他們往來貿易的活動。在這段期間，泉州商人往高麗者須先至明州註冊，往南海者須至廣州，往返極為不便，因此不但私自出海貿易，而且直接返向福建，形成走私貿易。前引文獻通考卷六二職官考十六載其事云：

泉人賈海外者，往復必使東詣廣（疑誤，他本作詣廣東），否則沒其貨。海道回遠，竊還家者過半，歲抵罪者衆。

這種情形，地方官並非不知，然始終未曾設法改善者，乃彼等能由其中獲得暴利。前引嘉祐八年（一〇六三）至治平二年（一〇六五）知泉州的關詠及參軍杜純事，即為最好的例證。至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行新法時，此一問題才受到重視。蓋新法以富國為主，市舶獲利不貲，當然亦在整頓之中，因此有人建議在泉州設置市舶司。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互市舶法條載：

熙寧五年（一〇七二），詔發運使薛向曰：「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請置司泉州，其規法講求。」

似乎中央政府已有在泉設置市舶司的打算，是以下詔薛向探討其規制，薛向正新黨理財能手。宋史卷三二八薛向傳載：

神宗知向材，以為江、浙、荆、淮發運使。……時方尚功利，王安石從中主之，御史數有言，不聽也。向以是益得展奮其材業。

薛向得王安石之信賴可知。但其後由於安石之去職（七年），議未果行。其後復有陳僞於元豐年間再次上書請求。萬曆泉州府志卷十陳僞傳載其事云：

陳僞，字君舉，（南劍州）沙縣人。……熙寧八年（一〇七五），召開封府屬，新法行，請外知泉州，以治行聞，召見，改惠州。元豐五年（一〇八三）復知泉州。舊法蕃商至，必使詣廣東，否則沒其貨，僞請立市舶於泉，詔從其議。（乾隆泉州府志卷二九同）

但據文獻通考卷六二所云：「太守陳僞奏疏願置市舶於泉，不報。」則宋廷對陳僞元豐五年之請，並未作成任何決定，故於元祐二年（一〇八七）舊黨執政後，始由李常之請於泉州設置了市舶司。續通鑑長編哲宗元祐二年十月條載：

泉州增置市舶，從戶部尚書李常請也。

李常原亦屬新黨，後因反對王安石青苗法之收息，遂出知於外，與新黨漸疏，及司

馬光執政，任其爲戶部尚書，以示政府無意再從事聚歛。宋史卷三四四李常傳云：熙寧初，（常）爲秘閣校理，王安石與之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安石立新法，常預議。不欲青苗收息……通判滑州……哲宗立，改吏部，進戶部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質於司馬光，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歛少息矣。」

可見李常亦頗受舊黨之猜忌，而其看法則略同於新黨，只因青苗法不主張收息，與安石等意見不和，遂爲舊黨所援引，以示舊黨之最不同於新黨處——「不急於征利」。是以元祐時李常之請置市舶於泉，可能是看到過去陳侂的奏書，只是舊事重提，也可能出自一己之新措施，而終蒙朝廷准許。初議置市舶於泉，始於新政，而竟成於舊黨爲政時，實始料所未及。

有關泉州自熙豐起即議置司，竟拖延達十五年之久始蒙批准的原因，日人成田節男以爲有兩個因素：其一是廣州方面的反對，其二是泉州內陸交通的不便⁹⁸。此二因素固有部份關係，但熙豐以來新舊黨交替爲政，政策始終搖擺不定，可能亦有部分原因（詳後）。

二、置司後泉州的對外交通：

泉州始置市舶，既成於舊黨之手，而彼等對新黨之「歛財」最表反對，其設置市舶於泉，係由與新黨有相同看法之李常所請，是故雖已置司，但並未受重視。因此由元祐二年（一〇八七）始置市舶至崇寧元年（一一〇二）甚或至大觀（一一〇七）以後，新黨有較長期之執政時，泉州市舶司始成定制。在其前近二十年中，泉州市舶屢設屢罷。此即曾知泉州，元符二年（一〇九九）復知廣州之朱服子或萍洲可談卷二所云：

崇寧初，三路各置提舉市舶官，三方唯廣最盛。官吏或侵漁，則商人就易處，故三方亦迭盛衰。朝廷嘗併泉州舶船令就廣，商人或不便之。

即可見此期泉州市舶之屢被罷廢，而「商人或不便之」一語說明了泉州商客及泉州對外貿易已達相當之基礎。其時罷時立，大體言之，舊黨上臺即廢市舶（或併入轉運使，茶鹽使等），新黨上臺，則又復置。如：

（一）徽宗崇寧元年（一一〇二）五月新黨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七月蔡京任相，於十一月即有杭州、明州市舶司依舊復置⁹⁹及三路各置提舉市舶之舉¹⁰⁰。是專任市舶官之始。

98 詳見成田節男，「宋元時代の泉州の發達と廣東の衰微」一文，頁四四。

99 見宋會要職官四四之八，玉海卷一八六。

100 見前引萍洲可談卷二。文獻通考卷二十市舶互市條亦云：「崇寧置提舉。」

(二)徽宗大觀元年(一一〇七)正月,蔡京復相,而於是年三月七日即有「廣南、福建、兩浙市舶依舊復置提舉官」之詔令¹⁰¹。

(三)大觀三年(一一〇九)六月,蔡京罷相,七月二日即「詔罷兩浙路提舉市舶官,令提舉常平兼理。」¹⁰²

(四)政和二年(一一一二)二月,蔡京復相,五月二十四日即有「兩浙、福建路依舊置市舶」¹⁰³之詔。

其間雖少見罷廢市舶之詔,但由新黨當政後之「復置」,即知其前必曾被罷廢¹⁰⁴。因此泉州市舶司雖云置於一〇八七年,但一直要到崇寧、大觀以後,其功能才充分發揮出來。距北宋之亡僅二十餘年!

論及置司後泉州對外的交通,在東北亞方面,并不曾受到置司與廢司的影響,對高麗之貿易仍持續不斷。唯哲宗以後,高麗史所載赴麗貿易華商多不繫其里貫,是以其後之宋商即無從知其籍貫。置司後宋麗貿易商客中,肯定知其為泉州商者有二人三次。哲宗元祐二年(一〇八七,即高麗宣宗四年三月甲戌)赴麗之宋商徐戩為一泉州商¹⁰⁵。元祐四年十月(一〇八九,宣宗六年十月)赴麗之宋商徐成,係泉州綱首¹⁰⁶。徐成次年(一〇九〇)三月曾再次赴高麗,這三次可以肯定屬泉州之商客,說明了福建與高麗間海上交通之繼續發展。其後元祐五年(一〇九〇)宋廷雖從蘇軾之請頒布了往高麗之禁令¹⁰⁷,但赴高麗貿易之宋商,仍絡繹於途¹⁰⁸,在這些商客中可能仍有極多的泉州人。

除此之外,與東北亞交通最值得注意的是赴日貿易亦有泉州商客。北宋時代日本正值藤原氏全盛時期,對外貿易採閉關政策,禁止國人私自渡海販宋,故往來宋日間者,多為宋商宋船¹⁰⁹。除兩浙明州、溫州、臺州籍不少外,福建商客(多福州人)亦不少。如一〇〇二年建州海商周世昌遭風漂至日本,一〇二六、一〇二七年

101 見宋會要職官四四之九。

102 同上註。

103 同上註。

104 有關新舊黨之傾軋對市舶之影響,此處無暇詳論。可參閱石文濟,「宋代市舶司之設置與職權」(史學叢刊創刊號,民五七),頁四五~一六一。第三章第三節市舶司與中央及地方之關係,第三與新舊黨爭之關係。惟仍有可供深入探討處。

105 「論高麗進奉狀」,見三蘇全集,東坡集,卷二七,頁十云:「同月三日准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知徐係泉州人。後更因售經板與高麗,為蘇軾「送千里外州軍編管。」

106 「乞禁商旅過外國狀」,見東坡集,卷二八,頁十八,有「據泉州綱首徐成狀稱」。可見彼亦為泉州人。

107 宋會要職官四四之八,元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刑部言。

108 見宋晞,「宋商在宋麗貿易中的貢獻」,頁一五四~九,「宋商赴麗一覽表」。

109 詳參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頁二七〇。

福州商客陳文祐兩度赴日及一〇二八年福州商客周文裔之赴日等均是¹¹⁰。但尚未見泉州商客赴日者，至泉州置司後，則出現了赴日貿易之泉州商客——李充。充不但在崇寧元年以後曾數度赴日¹¹¹，且留下了其在崇寧四年六月赴日本貿易時明州市舶司所發給之公憑。

往東北亞方向的交通，除至日、麗外，亦有至兩浙、江南東路販易者。前引莆田祥應廟碑有云：

往時遊商海賈冒風濤，歷險阻以牟利於他郡外蕃者，未嘗至祠下，往往不幸有覆舟於風波，遇盜于蒲葦者。其後郡民周尾商於兩浙，告神以往，舟次鬼子門，風濤作惡，頃刻萬變，舟人失道，涕泣相矚，尾曰……吾仗神之靈，不應有此，遂號呼以求助。虛空之中，若有應聲，俄頃風恬浪息，舟卒無虞。¹¹²

是商於兩浙者。宋會要食貨五十之一船項載建炎三年三月四日臣僚言：

自來閩、廣客船并海南蕃船轉海至鎮江府買賣至多，昨緣西兵作過，并張遇徒黨竟劫掠，商賈畏懼不來。欲下兩浙、福建、廣南提舉市舶司招誘興販，至江寧府岸下者抽解，收稅量減分數。

建炎三年在南渡後不久，其「自來」一語，當指北宋以降泉州商客已有至鎮江府貿易者。

至於論及對南海的貿易，前引莆田祥應廟碑續云：

又泉州綱首朱紡，舟往三佛齊國，亦請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迅速，無有艱阻，往返曾不暮年，後利百倍，前後之賈於外蕃者，未嘗有是，咸皆歸德於神。自是商人遠行，莫不來禱。

碑記成於紹興八年（一一三八），在南渡後十一年，此時祥應廟香火鼎盛，其溯源諸事，應在南渡以前不成問題。往三佛齊者，除朱紡外，尚有「前後之賈於外蕃者」，可見設司後泉州對南海之交通亦有長足之進步。

除此之外，泉州設市舶司後，曾遣人招納外人來華進貢貿易。宋會要職官四四之十載政和五年（一一一五）七月八日禮部奏云：

福建提舉市舶司狀，昨日興復市舶，已於泉州置來遠驛，與應用家事雜物等并足，定稿設饋送則例及以置使臣一員監市舶務門，兼充接引幹當來遠驛。及本司已出給公憑付劉著等收執，前去羅斛、占城國說諭招納，許令將寶貨

110 詳見木宮，前引書，頁二七一～九，「北宋交通一覽表」。

111 見木宮，前引書，頁二七九。

112 祥應廟碑記見閩中金石略，卷八，頁二十～五。

前來投進外，今照對慕化貢奉諸蕃國人等到來，合用迎接犒設津遣差破當直人從與押伴官等，有合預先措置申明事件。

其所招納之占城、羅斛兩國先後來到。會要同頁續云：

福建市舶司依崇寧二年二月六日朝貢招納到占城、羅斛二國前來進奉。內占城先累赴闕，係是廣州解發外，有羅斛國，自來不曾入貢，市舶司自應依政和令詢商其國遠近大小強弱，與己（已）入貢何國爲比奏。……八月十三日詔提舉福建市舶施述與轉一官，以詔誘抽買寶貨增益也。

由泉州市舶設立不久，即招到占城、羅斛之貢使觀之，其時占城等地泉州商人來往必極頻繁。至羅斛國（在真臘西，即今泰國暹羅灣一帶）則爲入貢我國之始，更可見泉州商人能力之大，其曾來往羅斛等地，亦係不爭之事實。而泉州市舶使施述與竟以此有功轉一官，更係宋代開始獎勵對外貿易官吏之表徵。其後宣和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更有泉州市舶使蔡柏及勾當公事趙實加官之舉：

詔福建提舉市舶蔡柏職事修舉，可特轉一官，勾當公事趙實轉一官，令再任。¹¹³

可見泉州市舶司在設置之初，已有良好之表現。可能係市舶收入極多，因而獎勵其主管官員，這更是往昔泉州對外貿易已有良好基礎所造成的。

再由北宋的市舶收入亦可看出泉州置司後的轉變。茲將文獻通考所見市舶收入資料列表於後，以作說明：

時 間	市舶收入(緡)	資 料 來 源
太宗時（九七六～九九七）	約五十萬	宋史張遜傳
仁宗皇祐間 （一〇四九～一〇五三）	五十三萬有餘	玉海卷一八六云：「海舶歲入象、犀、珠寶、香藥之類，皇祐中五十三萬有餘，治平中增十萬。」
英宗治平間 （一〇六四～一〇六七）	六十三萬	同右
徽宗崇寧、大觀年間 （一一〇二～一一一〇）	百萬以上	文獻通考卷二十，市舶互市條言：「崇寧置提舉，九年之間，收置一千萬矣。」 ¹¹⁴

由英宗治平年間之約六十三萬緡，一躍至崇寧以後之九年間收置一千萬，雖不能盡歸功於泉州之設置市舶司，但由前述泉州之招徠外蕃，及市舶官吏之曾受獎勵諸事來看，泉州新設市舶司與宋代市舶收入突增應有相當之連帶關係。這由南渡前兩年（宣和七年，一一二五）賜予三路市舶司的度牒數目，也可約略看出：

¹¹³ 見宋會要職官四四之十一。

¹¹⁴ 通考此段所載，崇寧置提舉，以後之九年，正崇寧之五年，加上大觀四年，因稱其崇寧、大觀間。

（宣和）七年三月十八日詔，降給空名度牒，廣南、福建路各五百道，兩浙路三百道，付逐路市舶司充折博本錢，仍每月具博貿并抽解到數目，申尚書省。¹¹⁵

以空白度牒賜三路市舶司爲博貿本錢，泉州竟與廣州同爲五百道，遠高於兩浙之三百道，可見泉州此時之入口貨額已在兩浙市舶司之上，而有與廣州市舶收入并駕齊驅之勢。

泉州在北宋設置市舶司，僅有短短的四十年（一〇八七～一一二七，如以崇寧、大觀起算，則僅二十餘年），有關市舶司設置後之史料又極貧乏，但由於往昔泉州對國內外貿易的良好基礎，及零星可見之資料，可知北宋之末，泉州對外貿易已可與廣州相比，南渡後在新局面的影響下，終於成爲我國對外貿易最大的港埠。

115 見宋會要職官四四之十一。